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191 期

2015 年 9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他山之石：美国种族关系困境症结与启示 马 戎

西藏的受援与可持续发展 靳 薇

【报刊文章】

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 马 戎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他山之石：美国种族关系困境症结与启示¹

马 戎

摘要：近期美国因暴力执法引发的抗议活动再度使人们关注美国的种族关系问题。美国黑人经历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通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2008 年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高票当选美国总统，人们将其看作美国种族关系得到改善的重要标志。但是近期出现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浪潮，提醒我们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文回顾了黑人在美国经历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制度、民权运动等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族群分层的视角比较了美国白人与黑人的群体性社会、经济差异，并进一步分析黑人内部出现的阶层分化及其社会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民权运动后新一代黑人精英和白人精英对美国种族关系的不同态度，努力归纳黑人精英人士的新特征。本文认为黑人精英群体和黑人底层社区之间的疏离和断裂，是造成黑人底层社区民众目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关现象的讨论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种族关系、种族隔离制度、族群优惠政策、社区文化

近两年美国国内的种族关系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14 年 8 月弗格森镇黑人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枪杀案一度引发全美抗议浪潮，随后是纽约市黑人加纳“锁喉案”涉案警察被判无罪，以及 2015 年 5 月巴尔的摩市的弗雷迪·格雷“非正常死亡案”。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对这些案件和民众抗议活动进行了大量报道。国际舆论普遍热议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和警察暴力执法问题，我国媒体和民众也在网上发表不少评论。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霸权国家的美国，在境外动辄对一些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如阿富汗、伊拉克），对另外一些国家实施制裁（如伊朗、俄罗斯），还对一些盟国政府首脑实行监听（如德国），宣称要派军舰军机进入中国所属南海岛礁的 12 海里领海，公然挑战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摆出一副“全球警察”凭靠武力执法的架势。然而，在美国对外政策如此霸道强势的同时，为什么国内又会屡屡出现种族关系的恶性事件，并导致全国性抗议风潮？中国政府的管理功能渗透到民众生活各个方面，因此，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更是难以理解为何美国人均 GDP 达 53867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狂印美钞，美军基地遍布世界，拥有强大的情报和司法警察队伍，但却长期难以控制和改善本国的种族

¹ 本文刊载于《学术月刊》2015 年第 8 期，在写作中得到美国纽约大学皇后学院孙雁教授许多帮助，特此致谢。

关系。

2008年和2012年美国两次选出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担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人们曾经一度将其视为美国种族关系改善的标志。那么，在奥巴马任期内为什么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反而呈现恶化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至今，美国的种族关系发生了哪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今天美国种族冲突的主要症结是什么？改善美国种族关系的出路在哪里？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种族关系变迁过程的初步梳理，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对我们思考中国当前的族群关系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近期爆发的群众抗议事件是不是黑人反对白人的运动？

首先，让我们来归纳一下与近期美国黑人抗议事件相关的几个现象：

1. 游行抗议者的主要标语和口号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举起手后不要开枪”（hands up, do not shot），“警察的暴力和谋杀必须停止”（Police brutality and murder must stop），“给布朗公正”（Justice for Mike Brown），“我们不反对警察，反对的是暴行”（Do not against police, but brutality），“黑人公民不是敌人”（Black citizens are not enemy）。从这些主要口号来看，各地抗议者所反对的不是美国宪法，不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并不针对白人群体，而是反对警察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执法行为和野蛮执法。

2. 在抗议游行队伍中可以看到少数白人和其他族裔人士参与，有的白人抗议者态度言词也很激烈。因此，对警察野蛮执法和带有种族歧视行为深感不满的，包括美国社会各阶层带有自由主义与人类平等理念的各族人士，并不仅限于黑人民众。

3. 在巴尔的摩市的格雷案中，该市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是黑人，宣布对逮捕格雷的6名警察提出刑事指控的市首席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是黑人。6名被指控的警察中有3名是黑人，其中黑人警察西泽·古德森受到的指控最为严重（包括二级谋杀、过失杀人、二级人身侵犯、驾车致人死亡和渎职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这些事件中受歧视的对象是黑人，但是涉案地区的市政府、市司法机构高级官员和警察中都有黑人，因此，这些事件并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白人压迫黑人”。民众的抗议针对的是警察部门执法行为带有的种族歧视色彩（即种族选择性），但整个事件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¹。

4. 近期在纽约等大城市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相对比较平和，主要原因是居住在大城市的黑人就业状况较好，也是外来黑人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区，所以主要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但小城市和郊区黑人聚居社区是失业黑人集中和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这里爆发的示威活动通常伴随着抢劫商店、焚烧公共建筑设施的暴力活动，甚至有人向警察开枪。在美国，涉及黑人案件的民众示威活动通常都伴随类似的暴力犯罪事件，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本地黑人²。

以上现象表明，近期美国发生的这些涉及黑人的事件并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因于种族矛盾和种族压迫。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读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应当如何通过这些事件来认识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变迁和未来走向？

二、美国种族关系演变历史

¹一些外国评论指出：“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占13%，然而被警察枪杀的受害者中有30%都是黑人。上述问题绝非巴尔的摩独有，类似现象在华盛顿距离白宫数公里远的街区也频频发生。在政界、警界、司法界主要职务皆由黑人担任的巴尔的摩，这些现象不能只用种族主义来解释”（西班牙《国家报》，引自《参考消息》2015年5月5日第8版）。

²例如1991年殴打黑人司机的4名警察被判无罪，在随后发生的洛杉矶暴乱中死亡人数超过50名，受伤人数超过2000名，超过1000幢大小建筑物被焚毁，经济损失在10亿美元左右。

<http://club.kdnet.net/disppbbs.asp?boardid=1&id=1069661>

由于美国种族问题十分复杂，源头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导致黑人迁移美洲的奴隶贸易，以及美国先后针对黑人实行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为了把当代美国的种族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简要回顾一下相关制度的演变历程和重要事件，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背景。美国历史上的种族矛盾头绪较多，既有欧洲白人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问题，也有白人、黑人、亚裔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白人与黑人的关系。

1. 奴隶制

黑人来到美洲的历史从奴隶贸易开始。“1517年巴托罗米奥卡萨斯主教通过许可西班牙人向美洲输入非洲奴隶以鼓励向新大陆移民时，新大陆贩卖人口的贸易就正式开始了”（富兰克林，1988：44）。16-19世纪被贩运到新大陆的黑人总数约为1388.75万人（富兰克林，1988：52）。1825年，美国的奴隶占西半球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索威尔，1993：235）。黑人奴隶主要在美国南部种植园从事农业劳动。为了永久性使用这些黑人奴隶，殖民者在北美恢复了在欧洲早已废除的奴隶制。1661年弗吉尼亚英国殖民政府通过了北美第一部明文确认奴隶制度的永久性并包括奴隶子孙后代的法律，此后所有黑奴及其子女在制度上都属于“永久奴隶”。奴隶制的正式确立是美国黑人史上的第一件大事。

在出售和购买黑人奴隶时，奴隶贩子和农场主刻意把来自非洲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黑人加以混杂，使他们无法用母语沟通，彼此之间缺乏传统的血缘和地缘网络，以便于农场主控制和管理黑人奴隶。这些做法完全破坏了黑人社会原有的组织和权威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伦理传统。分散在各农场的黑人奴隶被迫接受白人农场主强加于他们的所有规则。“他们（指白人农场主）不准奴隶使用姓氏，甚至连奴隶使用‘我姐姐’（妹妹）或‘我母亲’这样的称谓都可能遭到惩罚”（索威尔，1993：239）。奴隶们必须忘掉自己原来拥有的一切，只能学习讲英语，进农场主规定的教堂，在监工的皮鞭下劳作，无法拥有正常的婚姻与家庭。原属部落的社会组织、语言和文化传统在黑人当中完全失去传承的空间与可能性，这种文化传统的断裂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美国黑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空间。这是理解当代美国黑人问题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南方奴隶条例禁止奴隶拥有财产，未经允许不能离开主人地界，天黑不得外出，除教堂活动外不得与其他奴隶聚会，不得携带武器，即使是自卫也不得反击白人。条例不许白人教奴隶读书写字，并剥夺黑人法庭作证、指控白人的权利。……如果主人在惩罚奴隶时使其丧命，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条例还包括确定一个人种族的严格规定：任何哪怕有一丝非洲血统的人都应确定为黑人”（布林克利，2014：317）。这被称为“一滴血规则（one-drop rule）”，这一规则直到1910年才在田纳西州废除。这些规定充分显示，黑人奴隶在美国的奴隶制社会中不具备任何基本人权。

黑人奴隶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家庭仆役和种植园劳工。人数很少的黑人家庭仆役较快掌握了英语，与主人一起进教堂，接受主人信仰的宗教和价值伦理，有的甚至被允许组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日常交往中建立起与上层社会的某种接触。与之相比，广大种植园的劳工奴隶则在监工管理下辛苦劳作，可被任意出售或杀戮，对白人怀有更深的仇恨，他们无法建立稳定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在宗教信仰和价值伦理方面也与白人主流社会有较大距离，更不认同“白人的秩序”。早在奴隶制时代，在美国黑人内部即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阶层群体分化。这是我们理解美国黑人问题时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因素。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布林克利，2014：981），但是独立后的美国政府却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这一议题上保持沉默。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直至1808年英美两国才同意禁止贩卖奴隶的国际贸易。美国独立后，北方各州反对奴隶制，称为“禁奴州”，而南方各州坚持奴隶制，称为“蓄奴州”。延续了348年（1517-1865年）的奴隶制是美国黑人史的第一

个时期。

2. 种族隔离制度

美国种族关系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废除奴隶制。1862年9月林肯总统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宣布自1863年1月1日所有奴隶获得自由。1865年南北战争胜利后，黑人在法律上解除了奴隶身份。1871年政府颁布了制止“三K党”活动的法律。

南北战争后，黑人逐渐迁离南部并定居在全国各地，20世纪初期逐渐聚居在美国大城市。1982年以来美国黑人的城镇人口比例高达99%。黑人构成城市贫民主体，因此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也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

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分离但平等”的设施是符合宪法的，从而为在公共设施实行普遍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种族隔离制度的范围包括了居住、学校、军队、公共服务设施（旅店、火车、公共汽车、商店、餐馆）和娱乐场所（剧院、游乐场）等。美国各州在学校和公共服务设施中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和白人分别居住在各自的住宅区，黑人孩子在黑人区的黑人学校学习，进黑人区的黑人教堂。如果黑人去工厂或各类公司机构上班，必须乘坐黑人专用的公共汽车或车上的专用座位，他们被限制在黑人专用餐厅就餐，使用专用厕所。即使是一些在政府任职或有一定资产、拥有自己公司的黑人精英人士，也不能进入白人旅馆、俱乐部和购物、娱乐场所。因此，美国黑人特别是黑人精英阶层对这一歧视制度非常愤恨。

20世纪初美国开始出现有组织的黑人运动，著名的有“尼亚拉加运动”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 Du Bois）¹。在这一时期，美国黑人不同阶层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黑人中间新涌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为黑人运动的组织者、发言人和政治领袖。同时，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白人精英人士也参与了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运动（富兰克林，1988：383）。延续了69年（1895-1964年）的种族隔离制是美国黑人史的第二个时期。

三、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和“民权法案”

美国黑人史上的第三件大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权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黑人大批应征参军。战争后期，美国军队里逐步取消种族隔离²。二战结束后，一些黑人士兵根据美国政府的复员军人优惠政策进入大学读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黑人中产阶级。1965-1972年期间，黑人的大学年龄组人口中进入高校的比例增加了一倍，而白人几乎没有变化。“1960-1972年间，从事专门职业的白人人数大约增加了20%，而黑人在这方面的人数却几乎翻了一番。……黑人充当工头、工匠和警察的人数，增加到两倍，黑人工程师的人数则增加到三倍”（索威尔，1993：284）。一些获得高等教育和一定社会地位的黑人精英人士开始在各领域抵制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以美国《宪法》为武器，以人权为口号，对各州、各城市实施的具体隔离政策提出法律诉讼。这些抗议和诉讼活动首先在北部各州得到进展，并逐步扩展到南部。

1. 对住房和公共服务设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

在黑人的抗议浪潮和法律诉讼活动的推动下，1950年美国北部有9个州和8个城市通过法令，正式废除了公共住房中实行的种族隔离。1953年经最高法院裁决，华盛顿的旅店开始向黑人开放。1955年12月一名黑人人权运动领袖罗莎·帕克斯女士因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上坚持不给白人让座位而被捕入狱，引发各地黑人民众对公交车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浪潮，

¹ 1959年杜波依斯访华时，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²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里取消种族隔离部队所占比例从9%上升到30%。

一些州的火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废除种族隔离。这件事成为美国取消公共设施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著名事件。1960年2月，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黑人学生遭餐厅服务员拒绝，在伍尔沃思午餐店静坐示威，几星期内类似抗议活动遍布南方各州。1961年“种族平等协会”（CORE）成员集体乘坐长途汽车到南方各地，努力迫使各地汽车站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并与当地白人发生冲突。最后，肯尼迪总统下令取消美国所有汽车站、火车站的隔离政策（布林克利，2014：864）。

2. 对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

由于黑人学校教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都比较差，严重影响了黑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发展。因此，打破学校种族隔离，使黑人学生能够进入白人学校成为黑人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在这一进程中，法律诉讼同样成为最主要的抗争手段。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中宣布“隔离的教育设施本身就不可能平等”，判黑人女学生布朗胜诉¹。1955年联邦最高法院第二项判决要求各地“尽全力迅速”结束学校隔离现象，但将具体执行的时间期限留给下层法院决定。

1957年秋，南方3000个校区中只有684个取消了种族隔离。1957年9月，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学校黑人入学案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了联邦军队强制执行最高法院裁定，成为当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标志性事件（布林克利，2014：843-844）。在第二年9月，州长福布斯关闭了该州所有中学长达一年，以示抗议（莫鲁瓦，1977：389）。1962年，联邦法院裁定密西西比大学必须招收它的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因州长拒绝执行，肯尼迪总统派联邦军队执行这一判决。1963年，亚拉巴马州州长公开抵制联邦法院关于黑人学生进入亚拉巴马大学的判决，最后联邦执法队和首席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迫使其让步，判决得以实施（布林克利，2014：864-865）。“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令》加上13亿美元的拨款，进一步促进学校遵照民权法办事。到1965年9月，除南部和边界各州的124个学校地区之外，都提出了可以接受的遵照民权法取消种族歧视的计划，包括自由选择计划”（富兰克林，1988：567）。但是直至1965年，仍有80%的白人学生在学生总数中90-100%为白人的学校读书，65%的黑人学生在学生总数中65-100%为黑人的学校读书。

3. 黑人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抗争和《民权法案》

无论是在奴隶制还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美国黑人并不享有与白人相同的社会身分和平等的政治权利。甚至直至1958年，根据当地法律，“在南卡罗来纳、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其他南方各州，杀害黑人是不受任何惩罚的”（富兰克林，1988：543）。

二战后形势开始改变，“艾森豪威尔总统完成了军队的种族整合，并于1957年签署‘人权法案’，为希望注册选举的黑人提供联邦保障”（布林克利，2014：845）。在积极推动《民权法案》的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后不久，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1964年2月和6月先后通过了《民权法案》，禁止在联邦资助的工程和计划中实行种族歧视。

1965年《选举权法》经约翰逊总统提出，获得议会通过。《选举权法》颁布后，黑人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得以参与地方选举。1959年出现了第一名黑人众议员，1973年，黑人选出15位众议员和1位参议员（富兰克林，1988：574）。

在这个时期颁布的重要行政法令，值得一提的还有肯尼迪1961年第10925号总统行政令，明确提出当任何人向联邦政府以及与联邦政府有合同关系的机构谋职的时候，无论其种族、信仰、肤色和祖籍国，必须促进和保证人人都有平等机会。1965年第10426号发布的约翰逊总统行政令，更加具体地规定凡与联邦政府有含一万美元以上合同的机构，都需接受“肯定性行动”的限定。尼克松总统1969年提出的“费城计划”首次要求承包政府项目的企业书面保证执行“肯

¹ 布朗是一名黑人小学生，“她每天步行几英里到一所黑人隔离学校上学，而她家旁边几步之遥就有一所白人小学”。布朗因此到法院投诉当地的学校隔离制度无法使她就近入学（布林克利，2014：843）。

定性行动”的量化目标（numerical targets）和时间表（time tables）。

4. 黑人运动中的两个倾向

整体来看，在 60 年代美国黑人运动中同时存在政治诉求目标和斗争形式完全不同的两个倾向。一个可以被称为“理性派”，另一个可被称为“激进派”。

黑人运动的“理性派”主要是传统的、强调与善良白人合作的黑人组织。其中包括“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联盟”及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马丁·路德·金博士是亚特兰大市著名牧师的儿子，自己是浸礼会牧师，他坚持“非暴力原则”，“要求黑人一定要坚持和平抗议，可以任人逮捕，必要时可以忍受毒打，而且要以爱心对待仇恨”（布林克利，2014：845）。1963 年 8 月 28 日 20 多万示威者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示威活动，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这次示威活动成为人权运动的高潮¹。

但是到 60 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一些完全脱离人权运动主流的黑人组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黑人“激进派”组织是“黑豹党”。“黑豹党是一个准军事化组织，在公共场合耀武扬威地携带武器……（显示）武装起来的黑人自愿通过枪杆子为正义而战”（布林克利，2014：864）。“黑豹党”的发言人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宣称：美国面临的选择是“黑人的彻底自由，要不就是美国的彻底毁灭”（富兰克林，1988：571）。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有北卡罗纳州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他是《带枪的黑人》的作者，他反对马丁·路德·金的思路，主张黑人在必要时采取自卫还击，“用革命的暴力来反抗反革命的暴力”（黄绍湘，1979：718）。这一时期美国曾有 114 个城市爆发武装冲突和巷战，造成数千人死亡。“黑人权力会议”1967 年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召开，会议提出的目标是“把美国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白人的祖国，另一个是美国黑人的祖国”，进一步号召黑人参与武装暴力抗争（富兰克林，1988：571）。

在黑人运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在宗教上不认同白人主流社会基督新教的思潮，一些人改信伊斯兰教并改为穆斯林姓氏。黑人种族团体“伊斯兰国”成立于 1931 年，这个组织在 60 年代开始活跃。最著名的“黑人穆斯林”是马尔科姆·利特尔，他参加黑人运动后改名马尔科姆·X，以 X 来代表自己失去的非洲姓氏。他曾是一个吸毒者和皮条客，有坐牢经历，成为“伊斯兰国”领袖后于 1963 年 5 月在华盛顿设立“伊斯兰国”总部。他成为名望仅次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黑人领袖（布林克利，2014：868）²。

但是，通过联邦民权法案获得选举权后，部分激进的黑人却没有积极利用这一合法渠道来争取自己的平等权益。“令人泄气的是，18 到 24 岁的青年黑人的冷漠态度是那样严重，以致于在 1976 年登记的只有 38%，投票的更只有 26%”（富兰克林，1988：57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黑人的抗议示威时常伴随着暴力活动。例如 1964 年纽约哈勒姆区和 1965 年洛杉矶市沃茨区发生的种族骚乱导致 36 人死亡，1966 年在芝加哥和克利夫兰等地曾发生 43 起种族骚乱，在 1967 年发生的 8 起重大种族骚乱事件中共死亡 43 人（布林克利，2014：867）。这些暴力活动和伴随的抢劫商店、焚烧公共设施等活动，引发白人民众的普遍反感，也成为政府中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镇压黑人抗议活动的最好借口。

5. “民权运动”的推动力量

20 世纪中叶美国的“民权运动”的兴起，由几个不同的因素和社会力量所推动。

（1）二战经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黑人中下层民众有许多人曾经参加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或在战时工厂工作过，他们有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形成某种组织网络，其中一些人因政府的退伍军人政策获得高等教育，但是就业状况恶劣，对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极为反

¹ 1968 年马丁·路德·金博士被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杀。

² 1963 年，当马尔科姆·X“把肯尼迪总统的被暗杀说成是‘得到了恶报’时，他被黑色穆斯林开除了。马尔科姆·埃克斯本人于 1965 年初在纽约被暗杀，当时他正在参加他新组成的与黑色穆斯林相对抗的团体的群众大会”（富兰克林，1988：492）。

感。在 60 年代黑人运动中提出“武装斗争建立黑人国家”的“黑豹党”就是其中一些激进分子的代表。

(2) 战后都市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这些人在战后受过较好教育并在就业中取得一定成就，在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和社会普遍的种族歧视氛围，这些黑人中产阶级不能堂堂正正地迁入高收入住宅区、进入白人俱乐部和消费场所。从自身的经历中，这些黑人精英深感黑人在美国是“二等公民”，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带领底层黑人民众进行抗争。同时，这些黑人精英十分理性地反对暴力，更不认为美国黑人通过“民族自决”“独立建国”是可取和可行的政治目标。马丁·路德·金博士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

(3) “电视及其他通俗文化形式是唤醒黑人种族意识的另一个因素。战后一代黑人比以往任何黑人都能更多地、更生动地观察到一种现实——白人主体是在如何生活，黑人是如何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电视同样将示威活动播放给全国观众，使一个地区的抵抗运动能迅速激发其他地区的类似运动”（布林克利，2014：845-846）。新的传播手段完全改变了美国社会运动的形式和动员方式。

(4) 黑人的各种合法组织在民权运动也起到了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黑人成员占相当比例的各行业工会同样在声源（或资助）人权运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布林克利，2014：846）。

(5) 白人青年参与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越南战争。1965 年在南越的美军规模已达 10 万人，1967 年底达到 50 万人。越战耗费了 15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美军死亡 5.5 万人，伤残 30 多万人。美军在越南屠杀平民的残暴行径和士兵的战争经历及伤残牺牲，经新闻媒体和影视节目的传播引发美国民众的极大反弹，许多白人青年（包括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在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中出现了白人“新左派”¹，他们集体烧毁征兵证，崇拜格瓦拉、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反越战的同时热心支持黑人和少数族裔人权活动。1970 年 5 月 4 日国民卫队向示威学生开枪，导致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 4 名学生丧生，9 人受伤。10 天后密西西比杰克逊州立大学两名黑人示威学生被打死，这些流血事件迅速引发全国性抗议示威（布林克利，2014：890，906）。

由于在政治指向和时间上与反对越战、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社会风潮合拍，这使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和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得到相当数量的白人民众和青年学生的同情与支持。由于黑人仅占美国总人口的 11%，没有白人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民权法案》等是难以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并顺利实施的。

此外，二战后非洲许多前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建国，也提高了美国黑人的自尊心。“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独立大大改变了美国种族问题的世界意义，并且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种族平等运动”（富兰克林，1988：546）。前往非洲“寻根”甚至号召美国黑人“返回非洲”（主要目的是尼日利亚）（McLemore. Et al, 2001: 275），在黑人民众中曾经成为一股潮流，也从侧面助长了黑人激进分子在美国“独立建国”的世纪想象。

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另一个社会后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国家的黑人移民。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纽约）哈莱姆的居民有四分之一是西印度群岛人。从全国来看，西印度群岛人已大约占到黑人总人口的 1%，但他们在黑人专业人员、生意人或知名人士中，占有额外突出的比例”（索威尔，1993：276-277）。非洲一些国家独立后，一些非洲黑人学生开始申请到美国学习。这些来自西印度群岛特别是非洲的黑人有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向黑人

¹ “与‘新左派’运动密切相关的是一种公开挑战中产阶级社会的价值和传统的青年文化新潮。这种思潮被称做‘反文化’”。其表现形式包括年轻人蓄长发、穿奇装异服、吸毒、性解放、嬉皮士、摇滚乐等（布林克利，2014：890-895）。

学生开放的美国大学对这些黑人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他们成长的社会、文化与家庭环境与美国本土黑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研究者不能将他们与有漫长苦难经历的美国本土黑人混为一谈，这是我们在理解美国黑人问题时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因素。

四、美国新一代黑人精英阶层的出现

在一系列涉及黑人权利的法案和行政法令中，《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译作“平权法案”、“平权措施”、“反歧视行动”等）明确规定公立学校必须参照所在城镇人口的种族比例招收相应数量的黑人学生，要求大学在招收黑人等少数族裔学生时设立单独名额，实行优惠政策（Schuman, et al, 1997: 194; 王凡妹，2009）。这些法令不仅使黑人学生可以进入优秀中小学，而且大学校园也逐步向黑人优秀青年敞开。

例如以哈佛大学为首的“常春藤名校”在2006年至2009年这4年里，每年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约占招生总数的34%-42%，其中黑人学生占8.8%-10.5%¹。2006年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美国顶尖名校每年招收黑人学生的比例接近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相关政策的实施使美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出身名校、进入社会上层社会网络并在美国政界、司法界、军界、教育界、科技界崭露头角的黑人精英人士。奥巴马、赖斯、鲍威尔等人即是这些黑人精英的代表。近期有关“常春藤名校”招生情况的分析报告指出，哈佛大学招收的黑人学生中多达三分之二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学生、非洲移民子女或者种族通婚的后代，来自本土贫民区的黑人学生实际上很难进入一流大学。1981年就有美国学者指出：“地位显赫或引人注目的黑人，迄今一直大多出身于黑人精英世家，或出身于西印度群岛人家族”（索威尔，1993：287）。在美国黑人内部的阶层分化转型过程中，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外来移民这一因素不可忽视²。

1. “民权运动”后涌现的新一代黑人精英的特点

（1）新一代黑人精英首先获益于《民权法案》和《肯定性行动》法案，这在制度上使他们得以受到良好教育和顺利就业，否则即使是非洲移民、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后裔（如鲍威尔是牙买加移民后裔）或混血黑人（如奥巴马父亲是肯尼亚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也不可能进入美国一流大学。在《民权法案》和《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大环境下，这些黑人青年在哈佛大学等名校校园成长，与周围的白人师生结成社会网络，这为他们毕业后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美国社会为他们的“向上流动”打开了大门，他们很快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2）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新一代黑人精英就业成功后迁离黑人区，住进白人区并努力融入上层社会。他们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像主流社会的“美国人”而不仅仅是美国黑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尽量和黑人底层社区保持距离，避免被主流社会看作是“黑人代表人物”，特别是西印度群岛或非洲移民后裔在内心并不认同美国本土黑人，这种身份认同在客观上阻碍了他们去关心底层黑人民众的社会境遇以及为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去呼吁。

有的文章这样描述这一过程：“黑人族群中已经涌现了不少精英，涌现的过程中‘黑人名额’给了一些助力。这些精英成为精英的方式是离开黑人聚居的社区，和大部分不是黑人的同阶层人士交往，再一代一代地‘进化’到精英社会。而那些在很差的学区长大、父母都没怎么认真上过学、甚至大部分都没有一个完整家庭的黑人孩子，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渐渐走向精英的机会、甚至是过上体面的生活的机会，都很渺茫”³。

在新一代黑人精英中，甚至存在某些对自身所属种族的负面刻板印象。一项调查表明，认为

¹ <http://ivysuccess.com/index.html>.

² 与美国本土黑人相比，“西印度群岛人节俭得多，勤劳得多，而且更具创业精神。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学习较刻苦，成绩高出土生土长的黑人儿童。在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其生育率和犯罪率既低于美国黑人，也低于美国白人。……美国黑人称他们为‘黑人犹太’”（索威尔，1993：281）。

³ <http://hx.cnd.org/?p=110296>.

“黑人富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的比例在白人受访者中为 52%，而在黑人受访者中则高达 59%；认为“黑人生性懒惰”者在白人中所占的比例为 34%，而持有这种观点的黑人为 39%。“当问题涉及到黑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具有讨厌的社会特性时，而且当调查结果显示出白人与黑人在观点上的显著差异时，被调查的黑人对于其他黑人总是表现出比白人更为负面的评价”（Sniderman and Piazza, 1999: 232）。一些黑人精英人士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脱离了底层黑人社区，而且在感情上也与黑人社区渐行渐远。

(3) 学校和就业环境培育出新一代黑人精英的身份认同。这些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和体面职业的黑人精英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他们从心底里认同美国精神，其中一些人的政治认同发生根本转变，已经不再自视为是“黑人精英”，而转型为美国的“国家精英”。人们形象地把这些“脱胎换骨”的新一代黑人精英人士称为“黑皮白心”。这样的政治认同与身份定位使他们不再参与黑人的社会运动，甚至与草根黑人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像杜波依斯、马丁·路德·金博士、马尔科姆·X 那样既得到黑民众普遍拥护、又能博得白民众的同情、为黑人权利奋斗牺牲的黑人运动领袖。近期美国发生了多次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游行聚会，我们在电视屏幕和网络图片上看到的游行示威大多是群龙无首的自发动员，既没有统一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诉求，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有威望的领袖与代言人。

2. 新一代白人精英人士如何看待美国种族关系

在 20 世纪中叶，当时的美国白人精英和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在意识形态和道义上是反对种族主义的，许多白人积极主张种族平等，这与战后美国社会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关。但是，在《肯定性行动》推行四十几年后，新一代白人青年在竞争中切身感受到的是发展竞争中出现的“逆向歧视”，同时，他们在日常生活接触中感受到的是底层黑人社区具有负面色彩的“社区文化”（高犯罪率、辍学、毒品与黑社会、失业、对政府福利的高度依赖、不稳定的两性关系和破碎的家庭）。因此，他们虽然在政治表态时支持种族平等，对于历史上的奴隶制或多或少仍有某种负疚感，但在现实交往中却对黑人持有负面印象。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许多人都可以感觉到，真正关心如何改善底层黑人社会状况的白人精英人士其实并不多。影响白人对黑人态度的有以下几个因素。

(1) 对《肯定性行动》法案带来的“逆向歧视”的反感

在“肯定性行动”法案刚刚通过后不久，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格雷泽（Nathan Glazer）就出版了《肯定性歧视》（*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一书，把“肯定性行动”称之为针对白人公民的逆向歧视制度（Glazer, 1975）。随后，各地区陆续都发生了一些由于《肯定性行动》优惠政策的实施而利益和发展机会受损的白人提出的法律诉讼，都以美国宪法为武器来反对“逆向歧视”。

最著名的案例是 1978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艾伦·巴基（Allen Bakke）为白人男性，1973 和 1974 年先后两次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递交申请。1973 年，巴基的基准分高达 500 分中的 468 分，但遭淘汰。在巴基被淘汰之时，给“特别招生计划”（以少数族裔对象）预留的 16 个名额中仍有 4 个名额空缺。1974 年，巴基交申请的基准分达到 600 分中的 549 分，然而再次被拒。由于这两年通过特别招生计划进入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的申请者各项分数都远低于巴基的相应分数，巴基于是将加州大学告上了法庭，认为自己遭受了“逆向歧视”（王凡妹，2009）。该案引发全美对于“肯定性行动”是否违宪和对少数族裔优惠政策是否属于对白人歧视的大讨论，最后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巴基有权利在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学习，同时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对黑人实行“特别招生计划”也不违反宪法。

老一代白人由于自己对历史上歧视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和黑人的不幸境遇有亲身感受，大多对黑人表示同情。而一些年轻白人缺乏这些切身感受，往往从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自身权益受侵犯的角度来考虑，因而认为“肯定性行动”属于歧视。“在一般的白人当中该法（《肯定性行动》

法案)造成了强烈的愤满情绪,这种情绪又被日渐抬头的种族主义组织如三 K 党和美国纳粹党等所利用”(索威尔,1993:286)。白人主流社会的“代际更替”和新一代白人反对优惠政策的抗议诉讼,迫使美国各州根据本州白人的反弹力度逐步降低了“肯定性行动”的执行力度。

(2) 对少数黑人暴发户“炫富”行为的反感

另一个造成白人对黑人态度渐趋负面的现象是部分黑人暴发户的“炫富”和与新教徒传统价值不同的黑人社区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黑人精英大多在政界、司法界、教育界等机构任职,遵循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是,还有一部分黑人通过个人掌握的特殊技艺成为体育界、娱乐界的明星级人物。这些人迅速进入美国社会收入最高的人群,他们购买豪宅别墅、出入高档俱乐部、拥有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这些黑人暴发户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的“炫富”行为与许多白人富豪的低调生活和慈善捐献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也增加了白人民众对黑人的负面印象。如1994年辛普森杀妻案虽然最终被判无罪,但许多白人民众并不接受这一判决¹。这些事件无疑不利于在年轻一代白人民众心目中延续老一代白人对黑人历史境遇的同情。

(3) 不认同黑人贫民社区的“社区文化”

黑人贫民社区普遍存在几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高犯罪率(抢劫、毒品、卖淫等),二是中小学生的辍学率,三是黑社会帮派团伙横行,四是单亲家庭比例高,五是许多人对国家福利制度的高度依赖。以上述社会问题为特征的底层黑人社区文化模式与白人主流社会的新教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存在明显距离。黑人社区普遍存在的这些社会与文化现象使新一代白人和新一代黑人的心理和社会距离越来越大。

五、美国“族群分层”的整体发展态势

社会学把“社会分层”概念和研究方法引入族群关系研究,相关研究被称为“族群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主要是分析在一个社会中不同族群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从而对这个社会的族群平等和各族群的社会流动趋势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法案》、《肯定性行动》及相关法案、法令的帮助下,一批黑人青少年获得了接收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处在美国高等教育金字塔尖的8所“长青藤”名校本科生招收中的黑人学生比例长期以来大致接近黑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这些毕业于名校的黑人高才生逐渐进入美国社会的上层。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黑人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阶层分化和阶层隔离,看到社会底层黑人民众的教育、就业、收入情况急剧恶化。黑人内部的这种“两极化”的发展趋势部分表现在社会阶层隔离与种族隔离现象的重合与并立。在传统的“族群分层”研究中,我们看到的主要研究成果,大多是黑人与白人个体之间各种指标的相互比较。毫无疑问,这些量化指标的比较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社会结构中两个种族之间的相对发展态势,使我们能够在群体的层面了解美国种族关系的宏观图景。关于黑人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

1. 白人群体和黑人群体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距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02学年白人与黑人的大学资格考试成绩存在明显差距,黑人成绩甚至不如拉丁美洲裔学生。亚裔、拉美裔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母语不是英语,但是他们的成绩却超过母语是英语的黑人学生。我们考察的其他年份(图1为2005年)各族群考试成绩的差距大致如此,黑人学生的考试成绩始终排在印第安人和拉美裔的成绩之后。

在1977-1990年期间,每年美国黑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比前一个时期减少25%以上,但是同期每年亚裔人士获得博士学位的数目增长了82%(Ellison and Martin,1999:327)。2007年白

¹ “当全世界大多数人从证据上认定辛普森有罪时,超过70%以上的黑人却根据辛普森的肤色认定其无罪”(http://tieba.baidu.com/p/2204916604)。辛普森在2009年因绑架、武装抢劫等12项罪名被判入狱33年。

人中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为 30.5%，黑人为 17.3%，而亚裔高达 49.5%。近些年来，黑人与其他族群在教育水平方面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这一趋势无疑会对黑人青年未来的学习、就业和个人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表 1、美国大学资格考试成绩族际差距（2001-2002 年）

	白人	黑人	拉美裔	亚裔
平均分数(总分 1600)	1060	857	936	1070
低收入组、高分数组分数差	144	212	265	259
父母大学毕业比例 (%)	59.7	37.0	31.4	58.3
英语非母语 (%)	2.4	2.9	32.4	36.8
家庭年收入 3 万美元以下 (%)	11.8	45.7	46.1	35.3
家庭年收入 10 万美元以上 (%)	23.6	5.1	7.1	15.0

2005 年，在全美国的学术评价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 SAT）中，各族群考生的平均分数为：亚裔 1091 分，白人 1068 分，印第安人 982 分，墨西哥裔 916 分，波多黎各人 917 分，其他西班牙语裔 932 分，黑人 864 分（参见图 1）。黑人学生的考试成绩明显低于其他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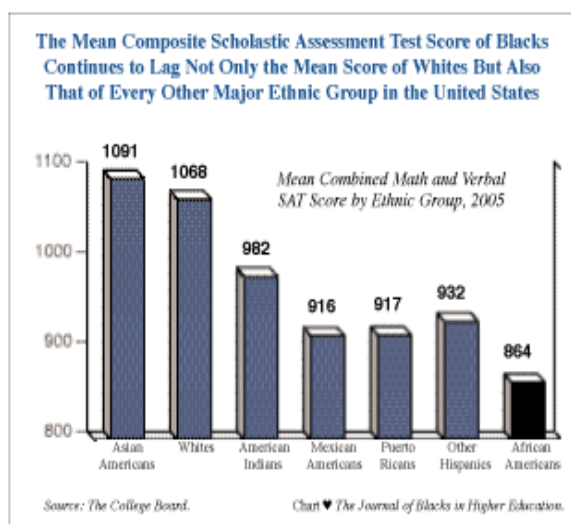


图 1、美国大学资格考试成绩族际差距（2005 年）

资料来源：美国纽约大学皇后学院孙雁教授提供。

有人把黑人受教育水平低的原因归之于黑人家庭收入低。但是一些调查发现，当家庭收入背景这一变量被带入受教育水平的族群差异分析时，学者发现来自年收入 5-6 万美元家庭的黑人学生的成绩与来自年收入 1-2 万美元的亚裔学生相似，以此说明黑人学习成绩较低并不是单纯地受家庭经济情况的影响（Sniderman and Piazza, 1999:231）。

2. 白人群体与黑人群体之间的失业率差距

据统计，“1977 年白人失业率是 6.3%，黑人则为 13.2%。白人青年的失业率约为 15%，黑人青年则为 40%-55%”（富兰克林，1988：579）。1995 年，美国全国黑人的平均失业率达到 12%，而白人仅为 3%。1999 年，美国黑人的失业率为 7.9%，白人为 4.3%（Popenoe, 2000: 255）。2012 年数据显示，弗格森镇所在的县，黑人失业率高达 26%，而白人失业率仅为 6.2%。黑人与白人在就业率方面的悬殊差距，与受教育水平、就业态度、犯罪率等因素密切相关¹。

3. 白人群体与黑人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1994年美国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标准是15,141美元,该年度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21,027美元。1994年白人家庭的贫困率为11.7%,黑人家庭的贫困率是30.6%（《华盛顿邮报》1995年10月6日）。1997年美国全国贫困人口占总数13.7%，在白人占8.4%，在黑人中为23.6%，在拉美裔中为24.7%。2006年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为：白人8.6%，黑人11.8%，亚裔23.2%，西班牙语裔24.7%（美国全国为11.1%）。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一般为白人家庭平均收入的60%左右（见表2）。

“杜克大学和位于华盛顿的咨询机构全球政策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流动财富（可轻松转换成现金的资产）中位数为200美元,拉丁裔家庭为340美元,而白人家庭为2.3万美元”²。另一项研究认为2005年“黑人家庭的资产净值平均为6100美元,而白人家庭则高达6.7万美元,几乎是黑人家庭的10倍。在住房方面,只有略高于48%的黑人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白人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却高于75%”³。这些指标显示出大多数黑人家庭的贫困状况。

表2. 1950-1995年美国各族群家庭平均收入变化

年份	白人 (美元)	黑人 (美元)	拉美裔 (美元)	占白人收入%		与白人实际收入差距	
				黑人	拉美裔	黑人	拉美裔
1950	3445	1869	-	54.3	-	1576	-
1960	5835	3233	-	55.4	-	2602	-
1970	10236	6516	-	63.7	-	3720	-
1980	21904	13843	14716	63.2	67.2	8061	7188
1990	36915	21423	23431	58.0	63.5	15492	13484
1995	42464	25970	24570	60.9	57.6	16676	18076

资料来源：帕里罗等，2002：184。

4. 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的犯罪率差距

在美国各族群当中,黑人的犯罪率高居首位。据1990年美国政府的统计,黑人因谋杀被逮捕的人数是白人的8.53倍,因抢劫被逮捕的人数是白人的14.3倍,因盗窃被逮捕的人数是白人的3.5倍。1990年,美国20-29岁的黑人男性中有23%正在坐牢或者处在缓刑或假释期(Ellison and Martin,1999: 367-368)。1995年,美国20-29岁的黑人男性当中有三分之一因犯罪进过监狱(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10月19日)。2000年共有791,600名男性黑人在服刑,规模大大超过同年黑人男性在校大学生(603,000人)。2010年黑人占美国人口13.6%,但黑人占2009年全美监狱犯人总数的46.1%(表2)。《美国司法统计》(U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表明在2010年,黑人男性中每10万人中有4347人正在监狱服刑,白人每10万人中有678人。图2表明,无论在男性中还是在女性中,黑人的犯罪率长期远高于其他族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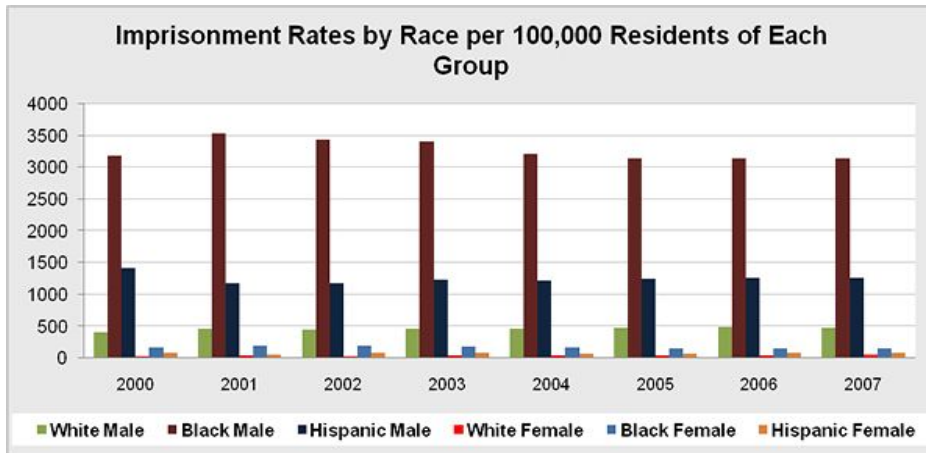
表2、美国在监狱服刑犯人种族比例(%)

	1930	1950	1970	2000	2010
白人	76.7	69.1	60.5	36.1	33.0
黑人	22.4	29.7	35.8	46.3	46.1
其他(拉美裔为主)	0.9	1.2	3.7	17.6	20.9

¹ 有多次犯罪记录的人,在他们出狱后通常在求职时遇到阻力。

² 美国《时代》周刊2015年5月18日文章,引自《参考消息》2015年5月9日第6版。

³ <http://wenda.haosou.com/q/1377343044063528?src=140>。



白人男性 黑人男性 西语裔男性 白人女性 黑人女性 西语裔女性

图 2、 各族群人口每 10 万人当中在监狱服刑人数（2000-2007 年）

资料来源：美国纽约大学皇后学院孙雁教授提供。

为什么美国社会有这么高的黑人入狱率？一些人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和 24 个州通过的一条名为“三振出局”（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的法例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一法例的“内容是以个人如果犯过两次案被定罪的话，第三次再犯时无论所犯罪名多么轻微（如只偷了几块饼），假如裁定有罪，他会被判坐牢 25 年以至终身监禁”（陈纪安，2002：112）。

因为黑人社区男性的超高犯罪率，美国警察为了控制当地的犯罪率和提高工作效率，就很自然地把这些黑人男性作为街头盘查的重要对象群体¹。因为许多黑人屡抓屡犯，从司法部门的角度看，最简单有效的预防犯罪的办法，就是把屡犯者终身监禁。而这些做法又反过来造成许多黑人家庭破碎甚至无法组建家庭，出现大量私生子，那些家中母亲做工、父亲坐牢的黑人少年辍学加入街头帮派，参与犯罪活动，形成了一个不断重复的恶性循环。

5. 黑人与白人在婚姻与家庭模式上的差异

黑人社区的两性关系和家庭状况也是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另一个社会问题。许多黑人青少年从小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以母亲为家长的黑人单亲家庭，从 1950 年占黑人家庭总数的 18% 上升到 1973 年的 33%”（索威尔，1993：285）。1997 年女性户主家庭在所有户数中的比例：白人为 9%，黑人为 32%。80 年代初，48% 的有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黑人家庭以女性为户主，而同类情况的白人家庭占 14%；在由 15-24 岁黑人女性生育的孩子当中，68% 是未婚母亲。全部黑人妇女中有 69% 从未结过婚（Ellison and Martin, 1999：368）。

1981 年美国白人已婚人口的离婚率为 10%，黑人的离婚率为 23.3%（罗贝，1988：185）。1981 年，50% 以上的黑人婴儿是由未婚妇女生育的，同期白人未婚妇女生育的婴儿仅占白人婴儿的 7%。1990 年，63.7% 黑人婴儿为婚外生育，56.2% 的黑人家庭是以女性为户主（Sniderman and Piazza, 1999：231）。由于美国对未婚母亲及子女、失业者、低收入贫困家庭在住房、医疗、生活费用（食品卷）等方面有很好的福利，许多不完整家庭的生活费用依靠的是政府的福利补贴。

不稳定的婚姻和不完整的家庭被普遍视作导致黑人诸多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家庭是孩子学习社会规范、培养自身观念与能力的重要场所，大量黑人婴儿属于非婚生儿童，得不到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收入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福利项目，女孩无法从母亲那里学习关于婚姻的伦理规范，男孩从未见过父亲或无法从父亲那里学习如何通过一个正常职业谋生的伦理和能

¹ 毋庸回避的是，死于美国警察枪下的布朗，据报道当天有抢劫商店的嫌疑，民众抗议的是布朗举起手后，警察不应开枪，抗议口号是“举起手后不要开枪”（hands up, do not shot）。死于“锁喉案”的加纳，据说有贩卖私烟的前科，“但罪不至死”。抗议的口号是“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

力，在这样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成长的黑人青年自然很难在美国社会找到个人发展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奴隶制时期，黑人传统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家庭伦理未能得到传承，二是高犯罪率导致大量黑人男性入狱和家庭破碎，三是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并不鼓励人们积极就业和辛苦劳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黑人社区出现普遍的非婚姻两性关系、高比例未婚生育子女、大量单亲家庭和不能在正常家庭环境中成长和接受社会规范教育的年轻一代黑人。

六、社会底层黑人的“文化模式”

在上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族群社会学常用的“族群分层”指标进行群体分析，即把黑人群体和白人各群体各自作为一个人口单元来进行比较。从引用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在黑人整体与白人整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族别差异。但是，这个比较方法也存在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即忽视了白人和黑人各自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状况。在群体比较中应用的指标，实际上是白人群体和黑人群体的平均值或中位数。假如黑人内部出现严重的阶层分化，上述比较方法很可能会掩盖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黑人贫困社区人口占黑人总数的五分之三，那么把以整群人口进行统计的这些数值集中到这部分人口上，相关的指标数字很可能会更加触目惊心。由于无法获得美国黑人群体内部社会分层的统计数据，下面通过一些描述性报道来帮助我们了解基层社会社区的生活状况。这些信息的代表性无法确认，但是生动地展示了黑人底层社区民众生活的现象。

1. 黑人贫困社区的学校与日常生活图景

许多来源提供的观察与分析都向我们证实，在美国黑人内部确实存在十分严重的阶层分化现象。一方面美国有一批社会地位很高的富裕黑人，另一方面也生活着许多居于社会底层、十分贫困的黑人民众。网上有一些对黑人贫困社区实际生活的非常生动的描述。例如一位曾在底特律公立学校任教的华人教师这样来描述底特律市贫困街区黑人的生活状况：

“(在底特律的)城区学校，6岁一年级的小黑孩就可以向老师扔椅子，骂老师 bitch(母狗)，初高中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你能想象你的学校期末考试 95%的人不及格么？何况这考试根本就是弱爆了，八年级的学生，考题是一百以内加减法，就这样还有 95%的人不及格！”偷窃……太平常了。小到老师的午饭，大到电脑、投影仪、手机。最狠的是有一次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的汽车钥匙放在桌子上被偷了，学生直接翘课就开着车去找黑 dealer 卖车了。老师发现钥匙没有后报了警。学校查监控录像，发现是这名学生，首先安排 juvenile court (少年罪犯法庭) 去控制车牌号，然后去抓人。但是由于底特律警力缺乏，居然没有立刻找到那辆车。但是由于这名学生只是初中生，驾驶技术不行，车子撞到别的车子惹了事，才控制住”。¹

¹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23340.html>。

在这些社区，“一早起来，少数有工作的人会去上班，那些没工作的人，会去市中心的赌场，或者去固定的地点开始准备犯罪。不愿犯罪的人就会去教会，等着吃免费午餐。再有些人会去上街，或者去附近的地方找零工打，还有些人在家打游戏。中午的时候，附近的教堂会异常热闹：大家来吃免费午餐了。吃过饭后，大家就会懒洋洋地聊天说话，吸点毒品，砸个玻璃抢个包，拦几个倒霉鬼要个小钱啥的。（帮派）火拼的一般都是下午，少的时候一边三五个人，多则七八个甚至十几个。”¹

2. 美国的福利制度和部分黑人对社会福利的依赖

美国社会有很好的福利政策，对失业者、单亲母亲、贫困家庭、病残者等都有很好的福利补贴。但是有时这些资助并没有能够帮助黑人重新就业，而是出现了另外一种风气，使一些人产生依赖感，甚至把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去换取现金，用来买毒品或赌博。一位曾在费城外卖店打工的华人学生这样在网上介绍费城的黑人区：

“黑人区的外卖店除了卖一些炸鸡翅和炒饭等一些速食外，还有一项很来钱的生意，就是换食品券 (food stamp)。很多低收入家庭每月都能从政府领到几百、上千美元的食品券，本意是给他们用来买食物的，不可以换成现金，但很多黑人都拿它来换钱。而黑人区的外卖店就以 7 美元现金换 10 元食品券的比例，从黑人那大量收购食品券，然后再到唐人街以 9 美元的比价换现金。每 1000 元食品券外卖店老板可以获得 200 元的净利润，20% 的利润。所以尽管这种兑换食品券的生意属于非法，政府常常派暗探来钓鱼执法，但因为利润太好了，那时大部分黑人区的外卖店都做这一勾当。政府食品券的发放是月底，所以外卖店月底到月初这 10 来天的生意最好，尤其每月的头五、六天，黑人来店里换钱的络绎不绝，好的时候一天能换六、七千美元的食品券，差的时候也有两、三千”。²

一篇描述底特律黑人区生活的文章这样写道：

“白人如果不工作的话，真的是会饿死的——因为底特律财政太差劲了，白人的补助发不出来，而且基本不给白人解决住处的。至于黑人嘛，不工作政府也会养着，黑人的补助不存在发不

¹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23340.html>。

² <http://tieba.baidu.com/p/2204916604>

下来这么一说，这是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确保的。有些黑人，政府还会给他们租房子住。总结一句就是黑人的福利要远好于白人，且更有保障。这也就解释了为啥就连这里很穷的白人都跑了”。

1

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描述的代表性提出疑问，但是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指出：“确实，在70年代有那么多黑人家庭失业而靠福利救济过活，因此美国很可能养了整整一代从来没有干过任何工作来养活自己的黑人。这种可能情况的含义是如此可怕，简直不堪设想”（富兰克林，1988：579）。写下这段话的约翰·富兰克林本人是一位著名黑人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在《美国黑人史》这本书中多次表达了对美国黑人社会发展前景的忧虑。

网上有篇文章这样分析美国黑人的发展态势：“为什么美国黑人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得到世人应有的尊敬？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因素包括黑人的某些传统，但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给予了美国黑人太多的照顾。使他们不靠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自在的生活，从而导致了多数美国黑人缺乏上进的动力。再举新奥尔良的例子：新奥尔良是黑人势力最大的城市之一，几十年来一直是黑人民主党执政。但新奥尔良的黑人生活却是最贫穷的，社会治安和环境奇差。黑人政客虽然可以给黑人群体带来更多的福利，但福利不能改变黑人的贫穷，反而使黑人越穷越依赖政府的救济”²。

“现在美国领取福利券的高达4800万人，差不多每6个美国人就有一个领福利。而事实是，美国根本不存在每6人就有一个活不下去的情况。太多的人在钻福利制度的空子。底特律黑人比例高，领取福利的人更多。有福利可领，那些在鬼城废弃房屋旁转悠、在曼哈顿黑人区哈莱姆的街头游手好闲的黑人等，才可以不去工作，因为可以躺在福利上吃别人，吃勤劳创造者的财富”

3。

美国有很好的福利制度，但是并不是高福利就可以解决贫困问题，如果这些资金发放得不得法，恐怕会导致政府和民众预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3. 黑人社区青少年的成长环境

在黑人区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黑人青少年，在心理上往往处于阴影之中。一名华人学生在与黑人学生接触后写下这样的话：

¹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23340.html>.

² <http://tieba.baidu.com/p/2204916604>.

³ <http://xueqiu.com/9081360174/25531164>.

“许多黑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愤怒，他们的祖祖辈辈可以追溯到黑奴时代。我曾在上学期的小组讨论会上问过他们，为什么时至今日，他们还在纠缠那段时光，并找出中国人的例子，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他们的回答是：第一，你们至少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第二，当你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环境、地区时，你没法不绝望”。……

“后来，一个黑人同事告诉我说，许多黑人小孩从小就只有参加帮派这一条路，因为父亲兄长等都是这样过来的。十几岁的孩子已经不敢计划将来，因为预计 20 岁就要死于帮派混战。他们生活的地区只有几条街之内，出了自己的地界就有生命危险。刚参加帮派时，他们需要证明自己已有勇气，一种方法是射杀无辜者。例如在高速路上晚上不开车灯，如果有车好心鸣笛示意，那就会成为受害者”。

黑人社区的这种文化模式进一步恶化了黑人青少年的社会流动状况，导致黑人远高于美国其他族群的犯罪率，并把黑人青少年推到了美国警察和司法体系的对立面，形成了社会底层黑人青少年与街头执法警察之间冲突不断的恶性循环。近日随着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和黑人的抗议活动，也出现多起白人警察被枪击身亡的事件（《参考消息》2015 年 5 月 11 日第 8 版）。这说明极少数黑人底层激进分子开始活跃起来，可以说是当年“黑豹党”精神的继续，即通过暴力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而不是通过和平示威来表达政治诉求。

4. 黑人与警察之间的互动

黑人社区有许多青少年并不愿意刻苦学习，其中一些人的梦想是练好篮球技术，进 NBA 球队，或者在田径场和各类体育比赛中一举成名，或者像麦可·杰克逊那样成为歌唱天才，这些都是凭特殊技艺而不用多年刻苦读书考试就可以出名挣大钱的捷径。所以，我们看到许多黑人青少年在街区的篮球场练习球技，在街头跳“街舞”，但是在学校的平均成绩却低于其他族群。另外一些人希望在帮派中混到“老大”的地位，有钱有势有派头。为了提高自己在帮派中的地位，他们通过参加斗殴凶杀来显示自己的残忍和取得信任，走上一条无法回头的人生之路。

1987 年春轰动全美国的新闻事件是纽约地铁枪杀案。一个每天乘地铁上下班的白人白领职员，由于一年里在地铁站台上被黑人青年抢窃 30 余次，屡次报案都不了了之，实在气不忿，自己买了一把手枪，这天早上在站台再次遇到 4 名黑人青少年持刀抢劫时，就向这 4 个人开枪，导致多名重伤，后来这名白人被全国通缉。当这个人的经历被电视媒体介绍给公众后，许多白人公开同情和支持这名开枪者，有的白人在报纸上登广告表示欢迎他来自己的家，称他是“我的朋友”。而黑人则万口一词地谴责开枪者，认为他防卫过当，属于种族歧视¹。当时我几乎天天观看电视节目中对这一案件的持续争论，印象极为深刻。

¹ 到了 2015 年，对于警察执法行为仍然在不同的态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莫里斯舆情研究所本周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认为执法人员对白人和黑人采取双重标准，44%的受访者认为没有这个问题。82%的黑人受访者认为警察采取双重标准，51%的白人受访者不赞同这种看法。调查还显示，50%的白人受访者相信警察不会在抓捕嫌犯时过度使用武力，而黑人受访者中只有 13%的人持这种看法”（<http://news.sina.com.cn/w/2014-12-11/000431270622.shtml>）。

关于警察暴力执法现象，还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费城警察的。

“费城警察殴打黑人有个特点，动手的基本上都是黑人警察，白人警察都在旁边看着。有次两个黑人青年毒贩被警察堵在店里，进来四个警察，两个黑人警察，两个白人警察。两个黑人警察对那两个黑人青年拳打脚踢，还用电棍捅，两个黑人青年被打得鲜血直流，在地板上打滚，而那两个白人警察则堵在门口，袖手旁观。第一次看到美国警察打人，而且是黑人警察打黑人，当时我心里很是震撼。后来类似的情景发生过好几次，几乎都是黑人警察动手，白人警察旁观。我进一步观察发现，到费城黑人区巡逻的警察以黑人警察为主，最少也是一黑一白搭配，绝少看到纯白人警察的巡逻车。联想到最近美国频繁发生的抗议白人警察射杀黑人的事件，而在费城这种抗议事件基本没发生，我想这是费城当局以黑人制黑人政策的成功”。

以上这些社会现象生动地勾画出黑人贫民区的“社区文化”，报刊媒体的持续报道也逐渐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加深了对“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stereotype)。另外，美国许多州的枪械管制很松，社会上有大量枪支，许多犯罪分子使用枪支与警察对峙，美国警察的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也正因为美国警察每天面临死亡的高风险，政府和司法部门对警察使用枪械不当案例的惩罚也相对比较宽容。

社会学家戈登在 1964 年曾这样描述黑人的低等阶级：“黑人低等阶级居住在北部和大都市中，他们的生活世界可以反映出他们来自南部乡村的社会背景。尽管他们现在居住在北部城市的贫民区，他们的日常口语依然带着浓厚的南部乡村低等阶级的口音。在他们的家庭和性生活模式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成年男子经常在外游荡着寻找工作，在家的女性则设法养家糊口，这就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遗弃、离婚、非法同居、私生子、家庭暴力都属于十分常见的现象，而且妇女成为家庭单元中占主导的稳定因素。由于她们必须长时间在外面工作来挣钱养家，孩子们通常得不到照料和管教，导致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戈登，2015：158）。

5. 底层黑人社区的现状与部分黑人精英的腐败相关

美国并不是一个杜绝腐败现象的社会，在“选票决定官员”的民主社会，一个政客（包括黑人政客）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来争取选票，选民的种族人口比例也使一些黑人政客在选举中打“种族牌”，籍此掩盖个人的腐败行为。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底特律市黑人官员的腐败现象：

“上任黑人市长克瓦姆·基尔帕特里克（当政 6 年），因欺诈、勒索、贪污、受贿等 24 项罪

行，被判刑 20 年。现任黑人市长戴维炳，是退役的 NBA 球员。据福克斯电视记者斯托赛 (John Stossel) 的报道，这位黑人球星市长也是腐败无能，他坐公家的豪华礼车去‘夜总会’多达 50 次，还把 29 个亲戚朋友安插到市政府部门。为什么底特律市政府如此腐败却能继续掌权，就因为他们得到黑人的支持，很多黑人不问是非，只问肤色。……黑人多支持左翼民主党，所以当选的黑人左派市长、议员们就热衷实行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宽容犯罪等社会主义政策”。¹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国家，这样的福利政策对于黑人社区带来的社会后果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部分确实需要救助的黑人家庭因此得到政府的资助，这无疑是一好事，但是如果高福利制度形成了一种带有惯性的社区文化，出现了许多黑人家庭对政府福利的高度依赖，那对大多数黑人青少年在学校努力学习，在就业中努力工作，切实提高自己社会竞争能力就有可能带来负作用。从长远看，也不利于黑人民众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美国社会争取真正的平等地位。

七、美国黑人群体内部的阶层性断裂与空间、心理区隔

为了与主流社会保持一致，许多进入社会上层的黑人精英加入了批评黑人社区负面现象的行列，并努力与这些贫穷社区保持距离。在一些社会调查中，我们看到一些黑人受访者对黑人有负面评价的一些提法也表示认同。同时，虽然也有部分高校的黑人学者始终关心底层黑人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种族歧视现象，但是他们无论对黑人社区的影响力还是对政府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

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区，族群精英人士的领袖角色和引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大多受过较好教育，有较宽阔的视野，也有与政府和其他族群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这个群体的大脑和心脏。我们在考察一个多族群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看看这个族群的精英集团是否与本族大多数民众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是否能够引导本族民众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开拓思路、学习吸收在现代化进程中领先族群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模式，他们是否提倡发展现代教育，以此提高本族青少年在社会流动中的竞争能力，是否鼓励他们以个人自身实力在主流社会中争取发展机会，从而逐步达到族群整体的向上社会流动，并在主流社会获得受尊重的地位和平等的话语权。概而言之，看看他们是否发挥了积极引导本族民众走上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在今天世界上的生存空间里，对于一个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否拥有一个从内心深爱本族广大民众，同时在族群发展路径上又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族群精英集团，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我们看到在美国黑人上层精英人士与底层黑人社区之间出现的结构“断裂”和空间“区隔”，使这一联系和推动作用基本上消失，导致失去领袖人物的黑人社区和底层广大民众的境况持续恶化，也使许多黑人青少年感到前景“毫无希望”而放弃自身努力。

尽管美国在法律上废除了居住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今天在美国各地实际依然存在边界大致清楚的“白人居住区”和“黑人居住区”。多种因素导致白人社区排斥黑人入住：(1) 白人害怕黑人住户把犯罪活动带入社区，造成治安问题，(2) 白人家长害怕子女与黑人交友，受到黑人文化影响，导致学习成绩下降；(3) 白人父母害怕女儿跟黑人男孩约会；(4)

¹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723340.html>

居住区的黑人住户多，会影响房价和租售；（5）白人如居住在种族混合社区，会被主流社会视为地位下降。这种事实上的种族居住隔离使黑人社区的生存条件每况日下：（1）2005 年，48% 的黑人小学生及 49% 的拉美裔小学生集中于“高度贫困区”，（2）在黑人占学生半数以上的学校里，有四分之一的数学老师无该科目学位¹。在这样的居住社区与学校环境中，是无法走出事业上有前途的黑人青年的。

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在 2014 年写了一篇题目为“种族隔离与黑人社区的人才流失”的短文，描述并分析了美国黑人精英与底层黑人社区之间的隔离程度，以及这种隔离对黑人社区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她的分析指出，废除居住方面种族隔离制度的目的是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给黑人社区带来了未曾料想的负面影响。

“自从 1954 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以来，种族隔离在法律上已经被废除。1965 年的民权法案，保障了少数族裔在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如今，如果少数族裔在就业、入学、住房、提升的时候遭受到任何歧视，可以根据平权法案上告法庭。然而，为什么过了半个世纪之后，黑人的贫民窟并没有消失、黑白之间的差距仍然如此之大？仅仅是因为种族歧视，还是有更多复杂的、深层的原因？”

“在观察了多个南方的小市镇——它们与最近的新闻热点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镇有共同特点——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黑人的社区只有贫民窟和蓝领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地位的黑人绝大部分都搬走了。即便是在黑人聚居的社区里面，商店的店主多数并不是黑人，而是白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为什么黑人社区里缺少黑人的小企业主？……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比亚特丽斯对我的问题作出了一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解答。

比亚特丽斯说，黑人社区在 20 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了大批中产阶级职业人士。由于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必须住在一起。医生、律师、教师、牧师、银行家等等，都是本社区之内的人。当时黑人赚的钱，在本社区内要转八圈才会转到外面去。（当今的犹太人社区内，钱要转十二圈。亚裔的数字恐怕更高）。这样本社区内的企业经营者也就有了可以保证的市场。种族隔离取消之后，黑人中的职业人士渐渐地离开了。现在黑人赚的钱，在本社区内连一圈都转不够，马上就在外面

¹ <http://www.edweek.org/ew/issues/achievement-gap/>

花掉了。……

马丁·路德·金本人就出生在亚特兰大市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父亲当牧师，母亲持家，兄弟姐妹三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白人上层中产阶级不相上下。他的家庭拥有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坐落在亚特兰大一个十九世纪中后期兴建的德国式建筑的小区里。不过，就在他们家房子的对面，有一排供穷人住的简易房子……。这是种族隔离时代的现象。在今天，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出现，由于地产状况的变化，现在美国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隔着一道地理上的鸿沟。而黑人中富裕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贫民之间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鸿沟。

在马丁·路德·金时代，黑人的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居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个教堂，去同一个商店，孩子们在一同玩耍，人们对彼此之间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黑人的领袖人物通常出身于受过教育的人当中。他们给整个社区树立了榜样，带领社区共同去争取权利与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黑人民权领袖的政治主张有几个特点。

首先，他们坚持非暴力。马丁·路德·金在哲学上奉印度的圣雄甘地为精神导师。尽管当时的警察使用暴力现象比如今严重不知道多少倍，可是他们并不主张以暴抗暴。这一方面固然是他们从根本上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相信通过合法的途径来推动进步，另一方面也是作为经济上的中上层阶级，他们并不希望砸烂现有的秩序。而且历史证明，非暴力的民权运动的确通过民主与法制的程序为少数族裔争取到了平等权利。

其次，这批民权运动领袖是教育的受益者，也是教育的提倡者。南北战争之后，最早涌现出来的一批黑人社区领袖将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比如奴隶出身、在阿拉巴马州兴办了著名的塔斯克基学院 (Tuskegee Institute) 的布克·T·华盛顿，在 1895 年代表南部的黑人与白人达成了“亚特兰大妥协”，承诺容忍种族隔离与歧视，条件是黑人必须免费获得基本教育。到了 20 世纪中叶，

黑人已经普遍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了高等院校。教育被认为是改善个人和族裔境遇的重要途径。因此，民权运动开始于在教育领域打破种族隔离是有历史根源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民权领袖们对家庭和宗教价值观的重视。自奴隶制时代以来，南部的黑人就笃信宗教。而废奴之后，黑人社区都成立了自身的教堂。（主要是基督教新教的浸信会和卫理会。）教堂的牧师就是当地的精神领袖，在他们中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民权活动人士。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是相当传统的，包括主张维护婚姻家庭、父母对儿女尽责，反对酗酒、吸毒等行为。他们尤其重视为黑人男性树立榜样，从穿戴举止到言语行动，要对外界树立起有尊严的形象。

今天美国黑人的成功人士，就是遵循着这条路走过来的。可是，随着种族隔离被打破，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各行各业获得的机会增加，受过教育的黑人不断地离开原来的社区。民权运动过去半个世纪之后，非洲裔美国人中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多种族的郊区。在各行各业的高层中——包括白宫里——都有大批黑人的身影。然而，黑人社区却失去了大批领袖以及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留在贫民区里的黑人青年也失去了模仿的榜样。虽然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了人们基本的衣食住，但是这又从另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无力感。中产阶级流失得越多，社区也就越贫穷；社区领袖离开了，地痞流氓就有机会横行；家庭楷模不见了，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单身母亲家庭的数目便直线上升；好教师走了，学校就败坏得惨不忍睹。

在这样的社区里，毒品与犯罪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警察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随之紧张。警察枪击嫌疑犯时有发生，而嫌疑犯枪击警察的事件也同样频繁。于是就有了弗格森那一幕。

这种在社会学上被称作‘brain drain’（人才流失）的现象到处都存在——发达国家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富裕社区吸引贫穷社区的人才。毕竟，人都愿意往高处走。……由于历史的原

因，黑人社区的人才流失比其他社区的规模更大更快。如何才能重建黑人社区？如何才能使中产阶级向社区回流？或者如何尽快解决贫民窟的现象，使得种族之间进一步融合？这些都是摆在美国社会面前的紧迫议题”。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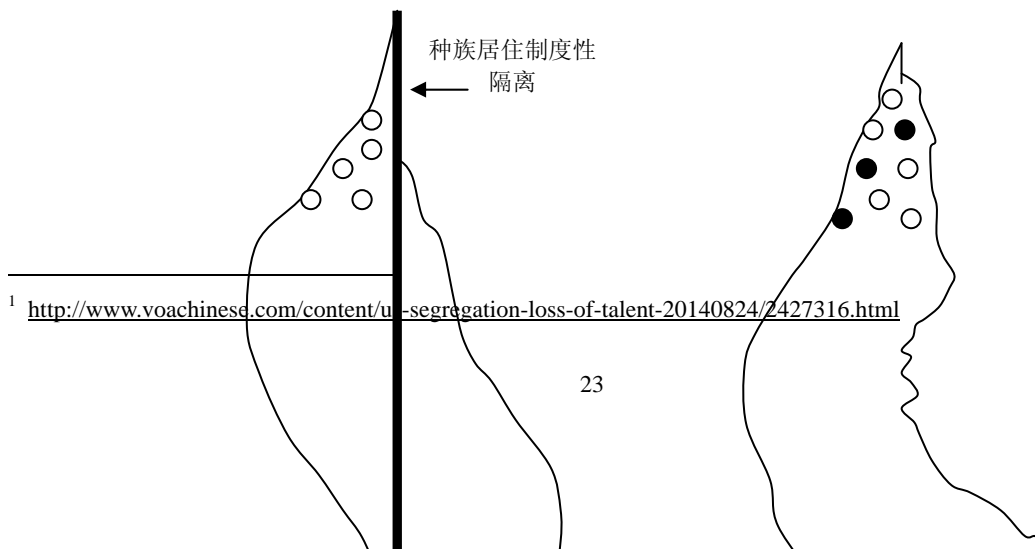
美国黑人群体内部的阶层性断裂与空间-心理区隔似乎是致命的，而且恰恰是 20 世纪中叶“民权运动”和“肯定性行动”等一系列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法律得以实施，才为这样一个黑人内部的阶层性断裂与空间-心理区隔创造了条件。历史似乎和美国黑人开了一个玩笑。

美国黑人与白人在语言与宗教信仰方面基本相同，母语是英语，信仰基督新教或天主教，这是二百多年彼此共处而形成的，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共性”。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心目中的价值伦理和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挂钩，而不是与种族身份挂钩。换言之，白人上层人士与黑人上层人士的价值伦理和行为规范是相似的，白人贫民与黑人贫民在价值伦理和行为规范是相似的。这使得有机会改进自身社会地位的黑人精英人士，在思想上认同并很愿意加入白人主流的上层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阻碍他们这样做的种族隔离制度极其痛恨。

但是，与种族相关的肤色及其他体质特征，又使得黑人在外观上极易与白人相互区分，成为一种“有形的差异”并产生距离感。在如何对待这一现实障碍时，有的黑人失去自尊并在内心痛恨自己的肤色。电影《士兵的故事》(The Soldier's Story) 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位黑人军曹，他责备上帝把自己生为黑人，并且经常虐待其他黑人士兵，最后被愤怒的黑人士兵杀死。另外一些黑人对此生出另一种反弹心理，宣称“黑色是美丽的”(Black is beautiful)，鼓励黑人青少年不要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自卑，而是应当自傲。

从白人方面来看，经过南北战争和“民权运动”之后，大多数白人精英和普通民众接受了种族平等的政治理念，黑人在许多城市已成为人口的多数，所以美国白人必须适应与黑人共同生存，而没有其他选择。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与白人共享基本价值伦理与行为规范的黑人上层精英被白人上层社会所接纳，他们接受了奥巴马和其他与之相似的黑人精英。这些黑人精英也在依照白人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做事，就像近期巴尔的摩的黑人市长、黑人检察官和黑人警察在遇到黑人嫌犯时所做的那样。因此，美国社会中肤色差异所带来的距离感也许主要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

图 3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美国“民权运动”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并为黑人提供了社会流动机会后发生的变化。在左图中，由于种族居住的制度性隔离，黑人和白人分别居住在各自的居住区，少量中上层黑人对黑人区下层民众发挥了激励的引领作用。右图显示的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居住模式，黑人和白人以不同比例散居在由贫富程度划定的三个居住区中，上层黑人迁入以白人为主的富人区，收入在贫困线上线下的黑人和白人居住在中间区，在底层的贫民区则聚居着大多数黑人和极个别赤贫的白人。此时尽管没有从前的清晰的居住区界线，但是房价/房租等无形的界线仍然使人们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区域分割。这种以贫富位标准的分区居住，客观上隔断了中上层黑人与底层黑人的日常接触，并在黑人贫民区形成了恶性循环的负面社区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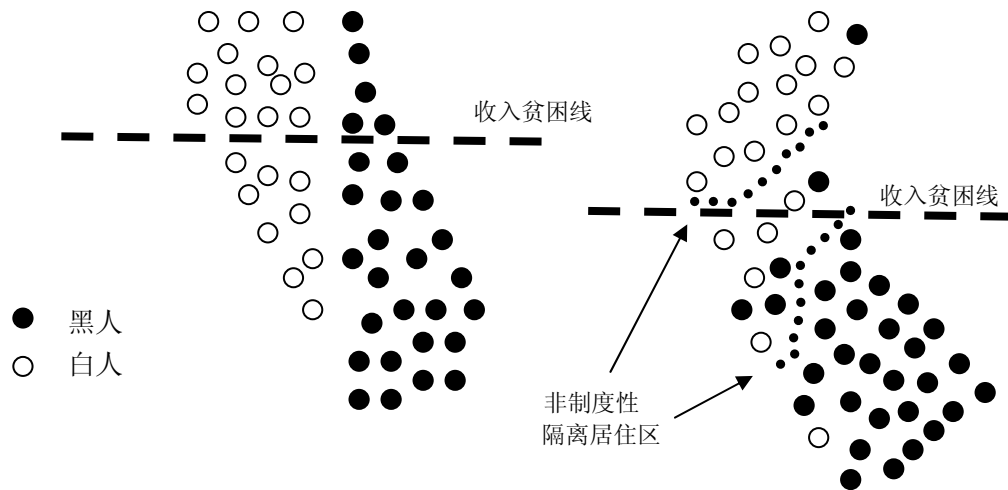


图 3、 废除种族聚居隔离制度前后的居住模式

从自身接受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个人利益出发，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白人青年和精英人士不会接受下层贫民区的“社区文化”（不完整家庭、高辍学率、高犯罪率、对社会福利的高度依赖等）。他们与底层社会的白人穷人之间同样保持距离，但是当他们遇到底层社会的黑人穷人时，这种距离感是双重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既有社会阶层之间在价值伦理和行为规范方面的“无形的差异”，又加上一层不同肤色的“有形的差异”。甚至一些接受新教伦理的中下层白人民众（包括普通警察、职员、工人等），也会因为不认同黑人贫民社区的“社区文化”而与这些底层黑人保持距离。这就使得黑人社区处在完全无助和毫无希望的境地。这里的居民和青少年感到自己被本族精英所抛弃，从白人中产阶级那里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与白人下层民众的接触大多是就业机会的无情竞争，和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感的，也许只剩下那些与他们共享这一“社区文化”的白人底层群体。

2010年，黑人男性每10万人中有4347人正在监狱服刑，在黑人人口中的比例高达4.35%，白人每10万人中有678人，占白人的0.67%。从这一数据对比中可以估算出黑人的犯罪率约为白人的6.4倍。只要黑人社区延续这样的高犯罪率，美国警察以下层黑人男性为主要盘查与执法对象的情形就不会改变，类似近期发生的布朗案、加纳案、格雷案等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也难以杜绝¹。近期几起含种族色彩的事件所引发的民众抗议活动，人数规模最多的只有两三万人，持续时间两三天。20世纪中叶“民权运动”时动辄几十万人的游行抗议场面已成为历史。这几起事件引发的风波已经平息，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美国下层黑人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在这些社区中成长起来的无数黑人青少年的人生道路已经无法改变了吗？美国如何才能走出当前在种族关系上面临的困局？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是针对这些现象所引发的普遍反思，会引导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美国的社会现实。

结束语

美国建国的历史与种族关系的演变史代表了殖民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与民族构建（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的一种类型，在许多方面是中国社会无法进行类比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观察美国社会种族关系变迁时思考一些人类社会具有共性的特征和进行社会结构演变进程的比

¹假如美国各地警察参照上述费城警察局的做法，淡化这类事件中的种族色彩，也许美国社会对这类事件的关注度会有所下降。

较。

美国种族关系演变也许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提供几个启示：

1. 族群平等、社会公正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必然导致被歧视群体的反抗。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平等，相互尊重，无论是作为中国主流群体的汉族，还是各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都不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隔离制度不利于各族民众之间的交流交往，更谈不上交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民权运动”要从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和公共服务设施中的种族隔离入手，争取开拓一个各族民众可以平等交往的社区与学习环境。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也需要借鉴这样一个思路，努力为民汉合校、民汉合班创造条件。一些地区各族群之间存在的语言差异不应当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少数民族学生掌握汉语是他们在中国社会成长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学生学习和掌握当地族群语言也是他们在当地发展的重要条件。

2. 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和平理性抗争的长远社会效果通常优于暴力斗争。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以武力抗争的激进的“黑豹党”只能是昙花一现。而主张非暴力、以切实兑现宪法中的平等人权为斗争目标的理性抗争，既可以团结本族的绝大多数成员，也可以获得主流群体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最后把各族民众和精英中（如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积极力量汇总到一起，从制度和法律上改变少数民族的传统不利地位，为下一代青年争取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与空间。

3. 族群优惠政策（如“肯定性行动”）在制度变革（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一个时期产生了积极正面的社会效果。但是随着主流群体的人口代际更替，主流群体的新一代人必然会质疑族群优惠政策的公平性。其中一部份人会像当年的“民权运动”的做法，同样以“兑现宪法中的平等人权”为旗帜开展法律诉讼，引发有关“逆向歧视”的社会反弹抗议。另一部分人则会因此而丧失对黑人境遇的同情，这同样不利于各种族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目前美国各州根据本地民众的反弹程度逐步调整“肯定性行动”对特定族群的优惠力度，是明智的做法。中国多年来也在一些领域（计划生育、大学招生等）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在最初推行时，获得主流群体的普遍支持。但是我们同样观察到，这些政策实行了几十年后，人口的“代际更替”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带来主流群体新一代对“逆向歧视”的反弹。这无疑十分不利于各族群之间的良性互动。

4. 美国实施的“肯定性行动”在培养新一代少数族裔精英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功。美国政坛、司法界、军界、企业家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杰出黑人精英人士。而且，这些在美国一流大学校园培养出来的黑人青年人才已经完全把自己的政治认同和身份定位为美国的“国家精英”，而不再像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精英那样主要是代表黑人利益的“族群领袖”。虽然美国本土黑人的这一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是否足够畅通，是否这些政策客观上为黑人移民第二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一点仍可争议，但是本土黑人中确有才华的青年一代毕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新一代黑人精英人士的政治认同和身份定位的改变，有效地化解了种族之间的整体性冲突，因此，在今天的美国已经看不到有领袖、有组织、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黑人运动，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与目前发生的关于警察暴力执法的小规模抗议活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从消除族群民族主义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美国通过一流大学培养少数族裔新一代精英的思路成效显著。

中国目前的思路仍然是把优秀的少数族裔学生选送到民族院校来培养，这些大学的少数族裔教师和学生相对集中、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实际上是斯大林理论）、偏重少数族群语言和史学学科教育的学习环境。我们能否借鉴美国的思路和做法，把各少数族群的优秀学生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选送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来培养，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开放的学习空间，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广阔的个人发展道路。这样的学习环境对于加强新一代少数族裔青

年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应当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青年的成功经历又为广大各族青年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这样无疑会促进中华各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5. 美国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看起来这样的高福利并没有真正解决下层黑人的贫困问题，结果反而造成了许多人对国家福利的依赖。这种依赖性一旦形成，任何调整或消减福利的做法都会导致底层民众的强烈反弹而造成社会动荡，变成“欲罢不能”的尴尬局面。美国今天一些城市（如底特律）甚至联邦政府出现的严重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相关。

中国正在努力步入“小康社会”，随着经济大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也有实力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包括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许多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建设、社会保障项目等，对于这些福利项目在实施中的社会效果，需要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来进行了解。目前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方政府积极向中央政府申请财政支持，用以提高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社会福利，这些申请通常也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考虑到美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长期施行福利政策的实际效果，中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假如这些福利补贴发放得不得法，恐怕会导致政府和民众预想不到的社会后果，而且这一社会后果真正的严重性就在于其难以逆转。

6. 我们看到美国“民权运动”以来在改善种族关系方面的实践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假如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和吸收少数族裔优秀青年进入一流大学，其结果是造成新一代少数族裔精英脱离了本族群民众，在族群内部阶级分化的进程中与本族下层民众、青年在地理空间和心理情感上出现“断裂”，使本族大多数民众失去前进中的正确引领，从而导致本族下层民众和青少年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兴趣、动力和基本能力，产生了一个极具负面色彩的“社区文化模式”（包括青少年的普遍厌学和高辍学率、帮派与黑社会泛滥、高犯罪率、不稳定的两性关系、家庭的不完整和高贫困率，对国家福利的高依赖率、与警察之间的恶性互动）。这个社会于是出现了带有种族色彩的新的社会问题，种族矛盾以新的形式出现并危及社会和谐与稳定。

一个多族群社会的少数族裔精英人士，应当担负起双重责任，第一个方面是理性地引导本族群与主流社会和中央政府进行良性互动。在这样的互动中积极为本族群争取平等权益，包括本族成员在选举、被选举和官员任用方面的政治权利，在语言使用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权利，与主流群体学生一样在国内一流大学学习的权利，平等参与国内各项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权利，保护本地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等。第二个方面是维系与本族中下层民众和社区成员（他们是本族人口的大多数）的密切交流，努力与本族大多数成员保持良性互动。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关心他们当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引导他们认清国家发展的大形势，引导他们辩证和历史地看待本族群的文化遗产，继承精华，剔除糟粕，推陈出新，引导他们客观地认识本族历史以及各族之间的交往历程，认识到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少数民族精英应当鼓励本族青年建立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同时还要鼓励本族青少年积极投身于传授现代知识体系的学校教育，在继承本族语言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来参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当本族部分青少年因个人发展不顺利而步入歧途时，我们必须努力防止类似美国黑人贫民区“社区文化”的成形与蔓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的吸毒、犯罪、黑社会团伙现象已不容忽视，需要引起中央政府、主流社会和少数民族精英人士的高度关注。

少数民族精英人士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把自己定位于“国家精英”，另一方面又要担负起引领本族民众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历史责任，那么，这两者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框架的角度上来思考，多元与一体之间完全可以是一种辩证的统一。正因为把自己定位为国家精英，少数民族精英人士必须站在国家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各项与少数民族相关的事务，但同时由于他们出身于少数民族，对本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群体心理有更深的

了解和情感，所以应当对本族民众和青少年负有引领的责任。假如有些人自己进入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行列后，对于本族出现的社会问题除了发发牢骚外，并不去实际作一些可以切实改善本族境遇和纠正负面倾向的事，那么出现少数民族精英与本族底层民众之间的“断裂”现象及后续的严重社会后果，恐怕就是难以避免的了。美国黑人社会问题出现目前困局的要害，很可能就在这里。

参考书目：

- B. 罗贝，1988，《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艾伦·布林克利，2014，《美国史》，邵旭东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 安德烈·莫鲁瓦，1977，《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纪安，2002，《美国法律》，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 黄绍湘，1979，《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 密尔顿·戈登，2015，《美国社会中的同化》，马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托马斯·索威尔，1993，《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凡妹，2009，“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从法律性文件的角度进行回顾与分析”，《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53期（2009年7月）。
- 文森特·帕里罗等，2002，《当代社会问题》，周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1988，《美国黑人史》，张冰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Ellison, Christopher G. and W. Allen Martin, 1999,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ing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 Glazer, Nathan 1975,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cLemore. S. Dale, Harriett D. Romo, and Susan G. Baker, 2001,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 (Sixth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Popenoe, David 2000, *Sociology* (11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Schuman, Howard, Charlotte Steeh, Lawrence Bobo, and Maria Krysan, 1997, *Racial Attitudes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niderman, Paul M. and Thomas Piazza, 1999, “Pictures in the Mind”, C. Ellison and W. A. Martin, eds.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ding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pp.230-237.

【论 文】

西藏的受援与可持续发展

靳 薇¹

¹ 作者为中央党校 民族宗教理论室 教授。

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由中央政府或相对发达的省市以资金、人才、工程项目等方式支持对口地区的经济建设。60年代初正式提出和实施，目前发展为三种主要方式：边疆地区对口支持（如援藏援疆）、重大工程对口支持（如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持（汶川、玉树地震灾后重建）。

198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援助西藏，1994年开启“分片负责、对口支持、定期轮换”援藏制度，举全国之力支持西藏发展。这种强力“助推”有哪些具体内容，能否帮助西藏发展并且可持续发展？

一、对口支援西藏

对西藏的援助主要有财政、项目、人才、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

（一）财政援助¹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支撑西藏社会运营，完全实现了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有效管理。

1、西藏社会经济的运行费用超过90%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1952~2013年间，中央财政补贴（累计5423.43亿元）在西藏财政总收入（累计5930.6亿元）中的比重占91.45%；中央财政补贴在西藏财政总支出（累计5872.13亿元）中的比重为92.36%。

2、中央财政补贴的增长速度快于西藏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1952~2013年财政年均增长速度²：西藏地方财政收入14.69%（258.2万元~110.42亿元），中央财政援助16.02%（1046.6万元~902.49亿元）。

3、西藏的经济运行也依靠中央财政支持

西藏的地方财政在1968~1989年的21年间一直为负收入，不仅政府机构靠中央财政支持，工厂等经济体的运行也是由中央财政维持。例如，1967~1970年，中央财政补贴占西藏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19.3%、176.35%、160.28%、172.84%。

表1：1984~2014年中央援藏项目投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年份	实施启动	项目数（个）	金额（亿）
1	1984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43	4.80
2	1991	八五计划江河项目	1	21.89
3	1994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62	48.60
4	2001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117	320.00
5	2005	自治区成立40年大庆	24	64.20
6	2006	十五期间	7	41.36
7	2007	十一五规划	188	1378.00
8	2011	十二五规划 ³	236	4192.00
小计			678	6070.85

资料来源：根据2014年西藏自治区发改委提供资料整理

¹ 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历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² 关于“平均增长速度”。中国一般用两种方法计算，一种是“水平法”，又称“几何平均法”，是以间隔期最后一年的水平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或下降）速度；另一种是“累计法”，又称“代数平均法”或“方程法”。本文使用的计算方法为“水平法”。

³ 西藏自治区《十二五建设项目规划方案》中，中央重点支持西藏226个重大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完成投资1931亿元。2014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中期调整方案”，项目调整为236个，总投资4192亿元。

（二）项目援助

1984 年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后，项目援助成为援藏的一个新的重要方式。项目援助是对特定的基础设施、社会发展项目进行的专门的资金和建设工程援助。1984~2013 年在西藏援助建设的项目，可按来源分为以下两类：

1、中央政府援建项目

一些大型项目是在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五年计划制订时中央政府批准的。至目前共 678 个项目，援助金额 6070.85 亿元。参见表 1。

2、对口援助省市实施项目

援建的项目中，还有各对口援藏的省市、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根据西藏地方的需要安排的援助项目。截止 2013 年，各对口援藏单位累计实施援藏项目 7615 个，落实援藏资金 260 亿元（西藏自治区发改委[2]，2014：5）。

二、援助与可持续发展

得到强力援助的西藏，是否可以通过援助推动经济的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一）西藏深陷援助依赖

近 30 年来的巨大援助，仍未帮助西藏摆脱全国最末的位置。2010 年西藏的一些指标位于全国¹最末一位或排名居后：人类发展指数²（HDI）西藏为 0.569，全国平均水平 0.693；平均受教育年限西藏 4.8 年³，全国平均水平 8.2 年；人均 GDP16875 元，居全国（平均 29992 元）第 27 位（UNDP，2013：89-94）。

（二）财政援助依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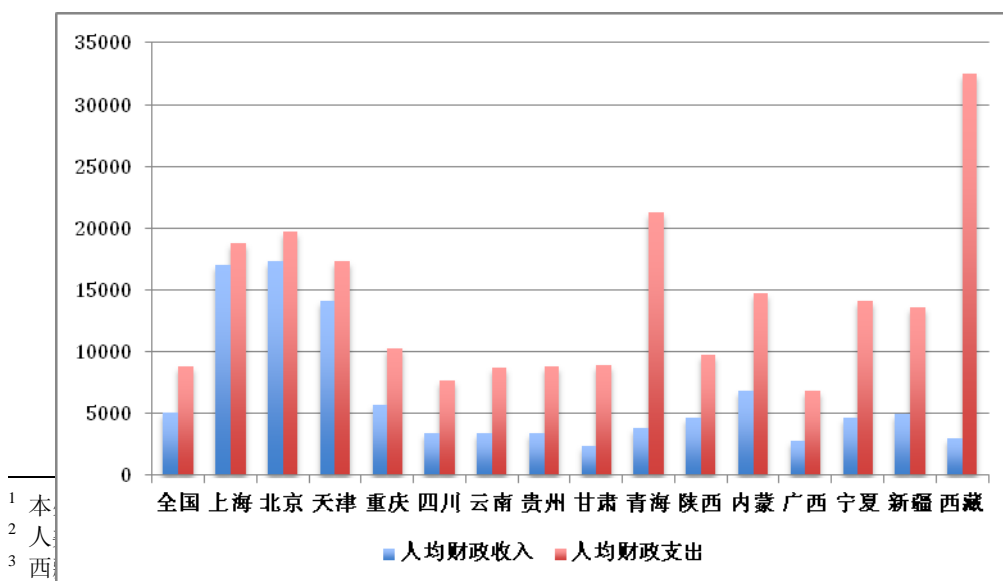
1、西藏的财政自给率全国最低

2013 年，西藏财政自给率 10.52%，全国倒数第一。

2、西藏人均财政支出全国最高

2013 年，西藏人均财政支出为 32509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797.94 元），为全国第一高（参见图 1）。即使与多民族的七省区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图 1： 2013 年全国及东西部各省区人均财政收入与支出 单位：千元



¹ 本
² 人
³ 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194，197。西藏统计年鉴 2014：343

3、西藏仍未具备自我发展能力

1952~2013 年间，西藏总财政自给率为 8.37%，直至 2013 年，西藏仍然没有长成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投资拉动依赖

1、投资主要依赖国家

至 2013 年，西藏的固定资产投资 56.59% 仍是国家预算内资金，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53%)，为全国第一高。而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等所占比例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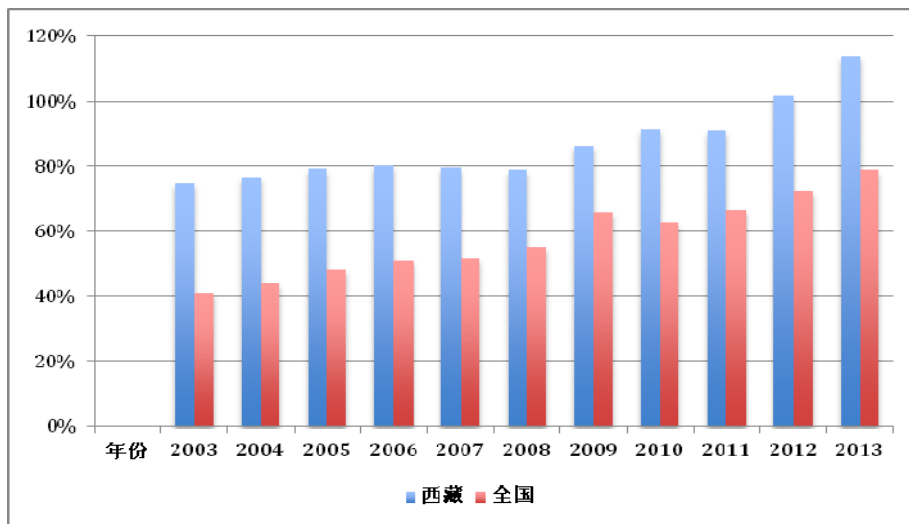
2、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

GDP 增长速度快但其中的财政收入比例很小。2001~2013 年，GDP 增长速度，全国平均 10.03%，西藏 12.36%；但是，地方财政收入占西藏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 7% 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及投资额超过 GDP。1959~2013 年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 15.78%；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1.81%。2003~2013 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75% 以上，2012~2013 年间比重甚至高于 100%¹，创造了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超过 GDP 的全国纪录！参见图 2。

近年西藏的经济增长受投资拉动的影响愈发明显，而投资来自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内地省市支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9）。

图 2：全国与西藏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显示图 单位：%



资料来源：西藏统计年鉴 2004-2014；中国统计年鉴 2004-2014.

3、经济增长幅度低于资金投入量

从 1959~2013 年的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可以看到西藏的经济“投入”与“产出”比例悬殊（参见表 2）。

¹ 2012 年为 101%，2013 年为 114%。

地方经济指标：西藏人均 GDP 增长了 92 倍，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约 13 倍。人均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近 590 倍。中央援助投入：人均财政补贴增长了 103 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1246 倍。

表 2： 西藏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一览表¹

	1959 年人均 ² (元)	2013 年人均 (元)	2013 较 1959 年 人均增长倍数	1959-2013 年均增长率%
GDP	141.69	25883.54	92.44	11.81
地方财政收入	108.31	3538.65	12.64	8.37
中央财政补贴	89.58	28922.25	103.29	12.98
固定资产投资	23.62	29232.69	1246.41	15.78
地方财政支出	57.00	33619.41	589.78	12.30

资料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9；西藏统计年鉴，1989，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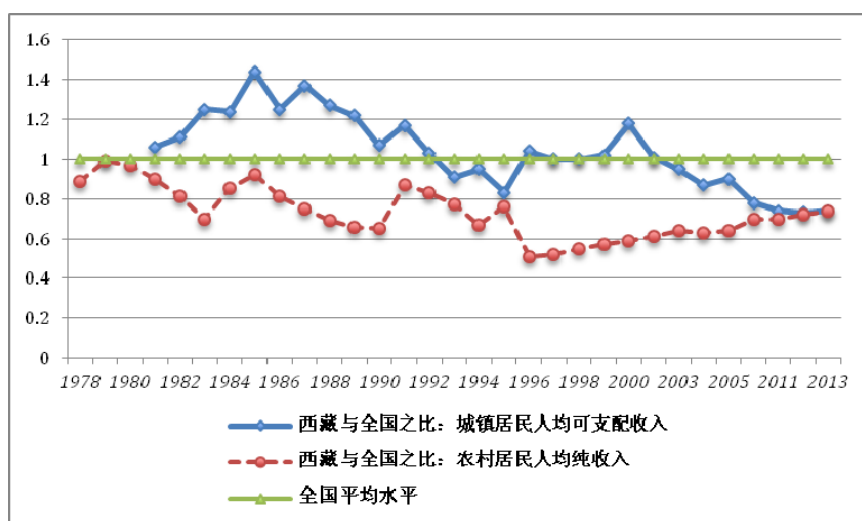
（四）越援助越贫困

资料分析发现，大规模的援助虽然带来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增长，但出现“相对贫困”即收入逐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出现了越援助越贫困的怪像。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趋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7 年西藏为全国的 137%。1994 年开始的超强力对口支持，没能影响居民收入趋低状况。2003 年以后，西藏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差距持续拉大，2013 年仅为全国的 74%。参见图 3。

图 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西藏与全国比较示意图³



资料来源：历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降无增

1970 年代下半以来，西藏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0 年以降，差距逐渐扩大。至 2013 年西藏只占全国的 74%。参见图 3。

¹ 本表数据没有排除物价上涨因素。

² 西藏自治区总人口，1959 年为 122.8 万人，2013 年 312.04 万人。西藏统计年鉴 1989：131，2014：29

³ 全国平均水平设定为 1。

三、反思与分析

中国的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加上多民族的青海、云南、贵州共 8 省区，面临着相似的历史环境和相同的政策，但形成财政和社会发展经费的绝大部分由中央补贴支撑的，全国仅西藏而已。

1952~2013 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在 29 年中是“补绝大部分”，在 33 年中是“补超额”，即中央财政补贴占西藏财政支出的 100% 以上。由补不足至补超额，是一个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减弱甚至萎缩的标志。西藏援助依赖的形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特殊性简单化

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力求“大一统”，忽略了西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异质性”即特殊性。

1、自治民族高比例聚居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西藏 300.22 万人口中，藏族占 90.48%。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产方式与内地差异极大。

2、地理位置偏居一隅，难以受到辐射影响

西藏被圈围在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等高山之中，海拔高、气候寒冷、荒漠遍布，地理环境严重封闭和制约着西藏。

与西藏毗邻的 4 个省区经济相对落后，与西藏接壤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国家为南亚贫困带，均不可能在经济上影响辐射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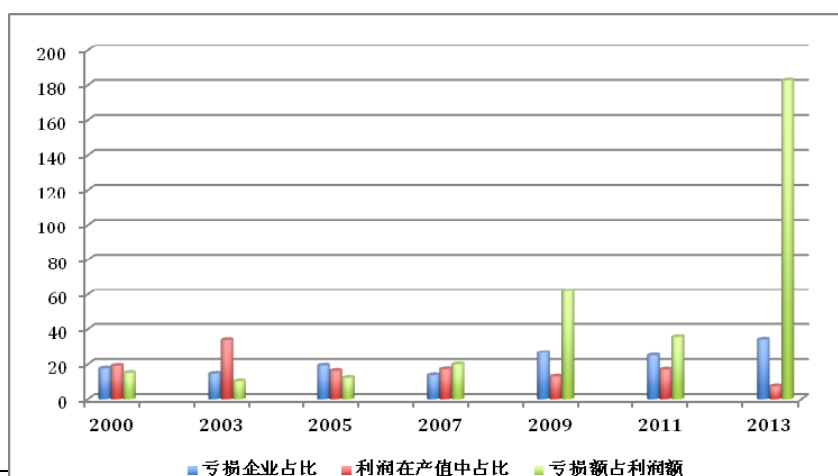
3、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特殊性缺乏全面认识

中央政府曾在 1950~60 年代强调西藏工作的特殊性，在政治上慎重稳进，带来经济社会较好地平衡发展。1980 年代之后高调突出特殊性，实际上将西藏的特殊性政治化、简单化，忽略了西藏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等真正特殊之处，忽略了人力资本存量、交通条件、市场发育程度等与现代经济直接相关的因素，延用“趋同”思路和赶超发展模式，强化了西藏对援助的依赖。

（二）盲目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追求通过工业化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富强，西藏在经济发展中，也遵循了这一思路。1959~1965 年西藏开始发展基础工业（乔元忠等，2002：50-54）。西藏办工业的历史，除了启动初期的灿烂一页，就是“亏损史”。

图 4： 西藏工业企业亏损示意图¹ 单位：%



¹ 2000-2005 年是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据，2006 年之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规模以上”在不同年份标准不一，2007 年以前为全国国有及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 年以后为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以上工业企业，2011 年后为主营业务 2000 万以上工业企业（西藏统计年鉴 2014：196）。

来源：《西藏统计年鉴》2001-2014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1. 企业收入辉煌时期

1952~1960年间，“企业收入”对西藏地方财政收入贡献显著。1960年，企业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60.78%。

2. 企业亏损

1963年开始，企业持续亏损，连累西藏地方财政收入1968~1988年的21年间一直是负值。

3. 增长得多亏损更多

西藏的企业亏损一直持续至今，近年企业产值和利润均在增长，但亏损情况日益严重，2013年亏损额度远超利润¹（利润7.34亿元，亏损13.41亿元），出现越发展越亏损、增长得多亏损更多的状况。

西藏盲目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选择工业化发展战略，未能使其经济摆脱“输血”，反而陷入对中央财政补贴的持续依赖。

（三）计划经济持续化

中国内地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了社会快速发展。西藏农牧区实行了“两个长期不变²”，企业也逐渐改制，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活力。

但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高强度的财政和项目援助，仍在持续强化计划经济的运营方式，经济效益低下甚至负效益，致使中央政府的巨额投资无法形成西藏经济的增长点。

1、被强化的计划经济

2013年，西藏的国企占21.94%，远超全国1.94%的平均水平。西藏的国企利税贡献只占0.17%，低于全国6.24%的平均值。西藏固定资产投资中，73.4%投向国有经济，高于同年全国平均水平（24.61%）。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西藏占57%，全国为5%。

2、无计划的计划经济

1980年后，援助“援出多门、政出多门”，17个省市、17家央企、59个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持西藏，因为无协调机构，不可能有通盘考虑和整体计划，其实是“无从计划”。成批次的项目数量多、额度大，且要求在一定时段内完成，前期的可行性论证流于形式，超前建设，造成项目失败、产能过剩和浪费。

（四）强化投资依赖

中央政府帮助西藏建设各类项目，目的是“启动西藏自我发展的活力、动力，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进入良性循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478）。但是，目前用大规模项目援助的方式进行建设，距既定目标较为遥远。

1、援建项目绝大部分不能生财

援建的项目主要有四类：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类项目，属社会福利设施；改善生活生产条件项目，属一次性投入的福利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耗资巨大，为生活水平提高和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生产、经营型项目，本应成为经济的生长点和财源，但普遍效益不佳，大多陷入亏损或倒闭。援建的所有项目，建成后均需要财政拨款维持，项目建成越多财政负担越重。

¹ 参见2001-2014历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针”资料。

² “两个长期不变”，即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的政策，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的政策，政府长期不予变更。

2、援建项目需要继续投资维持生存

笔者调查的援助建成项目，无一例外均反映资金紧缺，呼吁进一步投资以用于：维修，更新陈旧设备，添置新设备，偿还借款，生产流动资金，发放工资等。

资金紧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建成项目自我积累的能力普遍差，援建的项目并没有“成活”，并未形成西藏自治区本身的生产和发展能力。

继续投入大量的项目援助，投资维持的资金需求也将越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就越重，目前已经出现“项目援建→西藏民众生活改善→中央财政/对口支持地区出钱维持支撑所援建的项目→继续援建项目”的投资依赖循环，出现了“援助黑洞”。

（五）援助依赖的自我复制

1、援助成果变为新的援助需求

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在西藏持续地“补超额”援助，造成“援助黑洞”，援助成果自身又制造了继续援助的需要，援助将永无止境。

2、援助造成新差距

王代远等的研究发现，1994年以来巨额投入的项目援助，在西藏7个地区间投资差别较大，已经造成了新的地区差距。对口援助的23年间，获益最多的林芝地区人均得到5.38亿元项目援助，收益最少的昌都地区（人均0.56亿元）则只有林芝的10.41%。要消弭日益扩大的区内差距，只能靠继续加大援助力度。

五、结论与建议

二、主要结论：

（一）援助政策给西藏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援助政策，直接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西藏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明显增长。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一如既往的扶持和帮助。以实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平衡稳定发展，民众生活幸福，国家边疆安全。

（二）西藏陷入日益严重的援助依赖

由于对西藏民族、宗教、文化和地理等诸因素的特殊性重视不够，将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全盘移植到西藏，导致西藏产生了对中央财政、项目投资、社会管理等全方位的制度性依赖。近年各援助方投入的人财物日益攀升，已经出现越发展越（相对）贫困、愈增产愈亏损的窘迫局面。

如果目前的援助方式继续实施，这种全面依赖的状态仍将持续。制度性依赖的持续不利于西藏自身能力的成长，不利于形成积极进取的民族自尊，亦不利于国家安全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援助制度亟需创新

中央政府近三十年来持续强力援藏，而对传统援助方式缺乏效益评估和反思，显示了对援助的策略依赖；而受援的西藏形成援助依赖，援助制度亟需创新。

中央政府、边疆地方政府，各学科的研究者应当高度关注援助依赖、援助损害的消极作用，从制定援助法律、成立专门协调机构、进行援助评估、建立援方与受方互动机制等方面，创新援助制度。

二、相关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按“经济方式”搞经济建设的结果。西藏的经济建设也要尊重科学和规律，西藏的经济本身并不是政治，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发展、没有形成自身的发展能力，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和谐，这些才是政治问题。如果西藏的经济长期只有增长没有发展，无论中央怎样投资，其结果都是越来越处于相对贫困，

才会造成最大的政治问题。笔者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对创新援助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制订专门的援助法律

1、援助制度化

援助政策需要“制度化”。目前对口支援政策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延续时间、援助力度上有诸多不确定性，导致多重负面影响，中央、援方、受方三方政府深陷“互盲博弈”。援助政策的制度化有助于几方政府在“责权利”明确划分中兑现承诺，也有助于实现诸方利益博弈中的双赢和多赢。

2、法律保障

中央政府在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援助、援助制度法律化迫在眉睫。在地区立法体系中，尤以建立“地区发展根本法”和“不发达地区振兴法”为当务之急。可以考虑通过制定“西部开发法”，把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方针、实施手段、各有关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等重要问题予以明确的界定。

（二）建立专门的援助机构

近三十年的强力援藏，由于缺少统筹协调的专门机构，“人多乱、龙多旱”的局面在所难免。除造成浪费外，还导致污染环境、水资源透支、社会不稳定等后果。

1、在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

建议设立“援助边疆委员会”或“援助协调办公室”，受国务院直接领导，专门统筹和协调援藏工作。这一机构将在援助法律的指导下，制订各阶段的援助规划，领导、协调与落实援助法律和政策，督促检查援助资金的使用和项目的建设。

2、设立银行或基金会

建议设立“西藏援助发展银行”，或“西藏发展基金会”，统一管理援助西藏的资金。这一机构是独立的金融机构，其运作完全按市场化方式。作为第三方，完全独立地进行援助项目的执行前可行性论证评审、施工方招标、完成项目的效益评估等工作，减少援助资源的无效使用和人为浪费。

（三）建立财政约束制度

由于对西藏的财政补贴持续超过地方财政支出的90%，无约束的财政援助导致了财政依赖。

1、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

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支出用途。中央财政应从无条件改为有条件转移支付，规定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公共救济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

2、建立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由于财政补贴的“无条件”供给，政府部门在发展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缺乏积极性和内在动力；同时，又会追求支出最大化，进行过度风险投资，造成工程项目的浪费和低效率。

（四）积极探索“边疆发展模式”，支持实现边疆特色的现代化

1、充分认识西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西藏的地理气候条件、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市场发育程度等情况较为特殊，用内地或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规范”和强求西藏，是不可能成功的。西藏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立足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厚植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进而实现富民强区、长治久安。

2. 在确定西藏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完善援助方式

中央人民政府及兄弟省市，应该在西藏发展模式的框架内实行“发展援助”，以避免“援出多门”，形成众多奢侈浪费而于西藏民众无益的“援藏纪念碑”。

（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西藏能否将巨大援助由外来的“输血”转为自我的“造血”机能，关键在人。

西藏应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中高级人才到西藏工作，应重视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援助政策和项目要向增大西藏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向努力，着重提高西藏的“软实力”，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能力的成长，这是援助成功的决定要素。

（六）重视内源性发展，让民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和成果享受者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动员民众积极参与社会 and 经济发展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订《援助与社会发展规划》时，需要倾听地方民众代表和宗教领袖人物的意见，认真重视地方特点。

必须调动西藏民众的积极性，让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保证援助项目结合当地的实际，让民众充分参与不成为“局外人”，建立自尊和自豪感，这是援助政策完全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保证西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长治久安的重要方式。

出于理论正义和道义，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扶持援助，以期加快经济发展。但如果一味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忽视当地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忽略当地人的主体性，并不能达到援助的初衷和目的。举全国之力援助西藏，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参与式、包容性、融合式发展，确保西藏到 2020 年与全国一道建成小康社会。

【报刊文章】

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

（《环球时报》2015 年 8 月 27 日第 14 版）

马戎

近日在一个会议上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谈起“汉语”用法的利弊问题，他认为应该改称“国语”，因为“汉语”在多个少数民族语言中表达的直接意思就是“汉族的语言”，政府提倡学习双语，就被理解为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语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汉族“同化”的问题。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族绝大多数人口讲汉语。壮、白、撒拉、东乡、苗、瑶、蒙古、土、保安、羌、仡佬等族中有很大比例的干部民众通用汉语。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族际共同语”和“国家通用语”，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只是“汉族的语言”是一种十分偏狭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双语教学中对汉语的提法是“汉语普通话”，这是把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做了区别，但仍然强调的是“汉语”。

去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在谈到双语教育时，提法已经改为“国家通用语言”。但是社会各界对此的关注不够，在电视新闻、报纸杂志中仍在大量使用“汉语”一词，如有的报纸宣传少数民族“学好汉语，有利就业”，国外的孔子学院也在讨论“外国学生如何学好汉语”。今后这些提法应尽快统一起来。“国家通用语言”的提法是十分准确的，指的就是全体国民通用

的工具性语言文字,但是在口头表达中稍长了一些,不如在许多日常场合下进一步简化为“国语”。这一调整有几个好处:

一是使我国回族、满族等在语言方面的传统提法从“通用汉语”改为“通用国语”,名正而言顺。

二是有自己母语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各级学校和双语教育中所学习的是“国语”。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而不是目前所译的“汉族的语言”,有利于少数民族在观念上准确地理解“国语”。

三是与台湾的用语建立连接。民国时期把汉语学习称为“国语”,1932年叶圣陶、丰子恺编的《开明国语课本》近期在大陆一度十分流行。1949年后,台湾一直在推行“国语”教育,这是建立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

四是对海外的“汉语”教学起到重新“正名”的作用。教育部下属有“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下级机构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一些相关的社团组织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等也由“汉办”指导,其职能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但是,国外学生学习的“汉语”,译成英文是Chinese (language),直译是“中国的语言”。很显然,把Chinese (language)译成“汉语”,给外国学生留下的认知就是“汉”就是“中国”,那么藏、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语言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无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海外推动的是“国语(中国国家通用语言, Chinese language)”教学,就没有问题了。藏、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语言当然是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家通用语言”。从这个思路出发,也许教育部的“汉办”需要考虑更名了。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